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85 期 2023 年第 2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唐 辉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茉莉花茶的秘密

P8



步天记
——张钰哲先生的星空履痕

P21

书坛留痕
——乌山图书馆始末



世味流年

4 罗 南

茉莉花茶的秘密

左海风流

8 刘小敏

步天记
——张钰哲先生的星空履痕

15 叶仲健

刘崇乐与昆虫的故事

八闽文脉

21 萨本敦

书坛留痕
——乌山图书馆始末

26 平 之

风光抑或谍影
——福州近代影像发展述略

34 陈 宇

林徽因重回故里

41 苏少伟

“我要向这片土地致敬”
——克洛岱尔的福州叙事

走笔鼓岭

45 黄文山

宜夏别墅——1984

48 林思翔

鼓岭风云

53 鹿 野

流动的欢宴

59 张又新

一个“鼓岭人”在美国行医的故事

Contents

P26



风光抑或谍影
——福州近代影像发展述略

P45



宜夏别墅——1984

P53

流动的欢宴



闽都世家

63 汤明 / 郭大路

我的奶奶林宗素

69 方麒

闪耀在外交第一线的罗家后辈

双塔视野

75 青色

石上的叶向高

80 许维勤

郑成功与福州

侯官风采

85 唐希

江上阳歧

坊巷春秋

91 郑和

白马河，故乡的河

94 王发枝

儿时故地利发埕

封面 唐辉

闽江晨曦（摄影）

封二 陈济谋

三蟹图（国画）

封三 程伟杰

梦园（国画）

封底

金漆镂空石蝠鼎炉（漆器）

茉莉花茶的秘密

罗南

多年后，我的记忆里，福州的夏天似乎只剩下茉莉花了。一望无际的洁白花朵，在帝封江岸边，与远山相连，天空湛蓝，乌龙江水波光粼粼，一切都那么梦幻。

常想起那个女孩儿。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女孩儿坐在窗前，在小桌子上摆开一把茶壶、两只小茶杯，娴熟地洗茶、泡茶。那是三四月份的北京午后，阳光灿烂，鲁迅文学院的小院子里，玉兰花开得正盛。我和她临窗而坐，在宿舍里——宿舍很小，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两把小椅子，便是全部。我们常在午后，临窗而

坐，喝着茶，聊着与文学有关的事。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此后很多年里，每一个进过鲁迅文学院的人，内心深处都会留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专门用来存放那样一个落满阳光的午后。

有幽香。是茉莉花的香——专属于盛夏时节，茉莉花绽放的馥郁芬芳，从杯子里逸出。我端起茶杯，汤色清亮，抿一口，沁人的香，沁人的醇，只是看不到茉莉花朵。我曾泡过玫瑰花，或金茶花，或别的什么花，几朵干花放进杯里，腾着热气的开水倒进去，花便活过来了，在杯中旋转轻舞，次第开放。我已记不起汤色茶味如何



了，或许那并不重要，花开着就好，赏心悦目。我曾以为这就是花茶。那个遥远的北京午后，我突然看见了我的浅薄。让我讶异的，还有那女孩对茶的执着。她从福州来，千里迢迢的，竟还带着一整套茶具——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福州有了莫名的向往，那个地方，于茶，于人，似乎都自带魔性。

我对茶不陌生，我的家乡广西凌云县就是中国名茶之乡，凌云白毫茶是每一个凌云人的骄傲。可就茉莉花茶来说，再没有比福州更神奇的地方了，“得天独厚”这个词，似乎就是专门说与福州的——日照短，云雾缭绕，利于种茶；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透水性好，利于茉莉花生长。独特的气候、光照，让福州既孕育出优质的茶叶，也孕育出优质的茉莉花——花所特有的冰糖味，更是让福州茉莉花茶有着鲜明的辨识度。

那个落满阳光的北京午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茶叶与茉莉花之间，还有一个关于“窈”的制茶工艺。那是花与茶的密码。破解这道密码的

人，从远古，一辈辈走来，走到现在的人，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续坚守着这个关于花与茶的恒久秘密。

终于有幸，近前聆听。传承人七十多岁，脸膛红润，他的笑总是浅盈盈的一点点，却溢开去，流淌一屋，盛满一屋。岁月在他身上，日复一日地叠加，把茶的秘密说与他，把花的秘密说与他。他的双手，从少年时就一遍遍从花朵的身上抚过，从茶叶的身上抚过。他在寻找花与茶的秘密。他的祖父曾告诉他，破解密码的口诀只有七个字：蹉、塔、簸、窈、通、起、烘，而读懂它，除了需要漫长的岁月，还需要悟——有些人摸索了一辈子，仍一无所获，而有些人摸着摸着，有一天突然悟了，便就找到了。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福州的夏天带着茉莉花的香味。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种茉莉花。每到盛夏，提着茉莉花的小贩，穿行在车水马龙里，花香跟着人的脚步，弥漫着大街小巷。他们家世代制作茉莉花茶，祖父也说不



清这个手艺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而在史料里，福州的茉莉花茶在宋代就有记载了。

传承人年少光洁的手，在一遍又一遍的抚摩中，被岁月割伤，裂成一道道皱纹。很多年后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他皴裂的指头突然间感受到了它们。是的，那些秘密，花与茶的秘密，他终于找到它们。

传承人信赖时光，他觉得时光里有密码。万物皆有密码。最好的茶叶出在春天，最好的茉莉花开在夏天，因此，最好的茉莉花茶要在7月盛夏时才能制作。“制茶七字诀”中的前三步“蹙、塔、簸”是为了筛选茶叶，后四步“窨、通、起、烘”则要将茉莉花香窨入茶叶中。

传承人在竹匾里，铺上一层精心挑选的茶叶，再撒上一层当天采摘的茉莉花蕾，静置一段时间，让花朵与茶叶寻找彼此。

茉莉花通常在晚间开放，传承人便会用一整晚的时间来制作。在他的记忆里，有许多属于夏天的不眠之夜。此时，他蹲在竹匾旁，翻动着铺

在竹匾里的茶叶和茉莉花——那都是些花蕾，欲开未开，呈虎爪状。花的香还藏在蕊中——待到暮色降临，花瓣慢慢绽放，那些香便会逸出来，与茶香纠缠融合。静置，翻动，再静置，再翻动，直到晨光泛起，茶叶中满是花朵的香气。最后筛去花朵，只留下茶叶，用炭火烘干，便算是完成了一次窨制。

筛到一旁的花朵，花瓣完好，仍是白皙剔透，我双手掬起，送到鼻前，闻不到一丝香气。传承人笑说，这花没灵魂了。果真，细看之下，花是无神的，少了灵气，像是眼神空洞的人。莫非味道真的是花的魂？而此刻，花魂应正藏在茶叶中，与茶叶的魂融为一体。传承人说，茶为骨，花为魂。顶级茉莉花茶，花香要入骨，茶叶要保留茉莉花盛开时那抹最浓郁的香气，茶汤的口感要甘而不腻、清新爽冽。

每隔三天，这样的窨制过程就会重复一次，直到完成九次。其实，四窨已属特级，而七、八窨的茉莉花茶是顶尖，九窨更是寥寥无几。传承



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穷极一生，不断探索，就是要将茉莉花茶的灵魂完美呈现。这也是历代制茶师的梦想。九窠茉莉花茶，不是九次香气的叠加，而是香得恰到好处，让人品着茶汤时，感受到的，不是花也不是茶，而是茶树枝头原本就开着一朵茉莉花。

从选材开始，传承人就在不断破解密码。茶胚所选的芽头须得肥硕，茶芽要自带花香；花，自然是福州最好的茉莉花。九窠用的花，还须得是晴天下午采摘的饱满花蕾。讲究的制茶师，雨天是不做茶的，遇上阴雨天，窠制就得延期，这就意味着很难有九窠出现——随着窠制次数的增加，不可控的因素越来越多，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制茶师须得留心每个阶段花与茶的状态，及时调整——气温、胚温、水分含量、分堆大小的把控，通花散热的时机，干燥火工的判断……这些，都在考验着制茶师的功力。

传承人说，九窠过程的把握，更多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他用眼睛能感知，用鼻子能感知，用指头能感知。窠的时间不够，花香与茶香

融不成一体；窠的时间多了，却也过了。这是一种“度”的把握——也许，这就是他祖父所说的“悟”。当他还是少年时，双手每抚过一次茶叶与花朵，这种感觉就渗入他身体一次，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丝丝缕缕的不断渗入，最后化为“悟”。

2012年，福州茉莉花茶被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世界名茶”称号，这也是福州市荣获“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称号之后再获殊荣。而“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更是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在摩洛哥王国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宣布，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包括福州茉莉花茶窠制工艺，这是福州首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诸多荣誉，似乎都在叠加着，让“窠”这个古老的制茶工艺更焕发着迷人的色彩，这一道道变化莫测的密码，承载着制茶师对茶的专注和深情，将一代代传递下去。



步 天 记

——张钰哲先生的星空履痕

刘小敏

一直对天文学家们深感好奇。浩渺宇宙，星汉灿烂，我们的一生中曾有多少次仰望苍穹？平常人只能遥望的深邃无垠，在那些拥抱星辰大海的智者们的眼中又是怎样的存在？闽籍天文学家群体的卓越为世人瞩目，中国现代天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张钰哲（1902-1986），便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寻觅张钰哲先生人生履痕之际，那些穿越时空的璀璨扑面而来……



张钰哲

1. 奇点

开启张钰哲“天眼”的，或者是童年时代的一次星空夜宴？

2002年，纪念张钰哲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台刊发布了《张钰哲先生年表》：1902年2月16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07-1912年就读于福州明伦小学；1910年初见

哈雷彗星……

当年也是明伦学子的萨孟武，晚年曾在回忆录《学生时代》中记录下目睹哈雷的情景，“天上出现了彗星，每晚7时出现，10点才看不见。该彗星极长，又极亮光，令人望之发生畏惧情感。彗星消失之后，一夜天上又出现五色……”

那一年，张钰哲年方8岁。

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的张钰哲，儿时家境颇为艰难——两岁时父亲便已去世，寡母拉扯着几个孩子清贫度日，交不起学费的他申请免费方才入读明伦小学。1905年以福州府学明伦堂改办而成的这所小学紧挨孔庙，传承悠远，科举时代必读的《左传》《孟子》之类古籍均为学业重点。但新风亦已潜入学堂，设有理科和读经等各式课程，教学多以启发为主，毕业则只考国文、算术与历史三门。

孩童们想来也多是“就近入学”。那一带大户宅院不少，闽都名门萨家便有好几位子侄就读明伦小学；选充佾生参加祭孔仪式时，萨孟武便是乘轿从自家后门的小巷抄近路前往孔庙。居住在花园路芙蓉弄一座小院的张钰哲，上学更是极近，出家门经花园路抵学院前巷，没几分钟便可抵达校园（今市广电宿舍位置）。被称作“学院前”的这条街道，以清代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提督福建学院署设于此地而得名（今延安中学位置）。这一带历史上便是福州文化教育机构集中的区域，连带着许多地名也沾上儒雅之气，诸如府学里、府学弄、学院前、学院后、文昌弄等。就连曾是福州两大寿山石集散地之一的花园路，最初本名也叫“闽县学前”——宋代闽县的儒学便建在其东侧。

学子云集之地，诗书活动自当发达，学院前一带便曾有多户私家刻书坊。时代更迭，新式学堂已然办起，现代读物亦渐渐亮相。少年张钰哲与《上下古今谈》是否相逢在家乡的小书摊？

这本吴稚晖所著科普小说畅谈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为张钰哲迈向星空之旅很是助推了一把。他与中国古代以诗歌形式记载星宿的《步天歌》，想必结缘于“巷南巷北读书声”的朱紫名坊；在明伦小学打下深厚国学功底的张钰哲，后来一直爱写诗，诗歌中屡屡出现“步天”的字眼。

特地前往张钰哲故居寻访，芙蓉弄7号。长约百米的小巷高墙夹拥，弥散着隔世般的清幽古韵。故居临街墙面悬挂牌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开大门从露天通道直抵二重门，却是紧闭无人应答。这里大约在清道光年间始建有闽都传统的五间排木结构房屋，天井、前厅、厢房，张钰哲便出生在后厢房的小披榭，一住十几年，他曾亲手在小院栽植下黄皮树和龙眼树。岁月已经蚕食去两株树木和部分房舍，留存的故居眼下被保护性使用，那些驻足此间的商界人士可是被一个天文学家的气场吸引至此？

宇宙从奇点开始膨胀，它所有的密码都隐藏在混沌初开之际。天文学家张钰哲人生之路的“奇点”，正是芙蓉弄那座幽静的小院，是朱紫坊街区书香飘溢的巷道，是被誉为海滨邹鲁的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2. 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1913年，就职于北京的二哥将家人接去同住，明伦小学毕业生张钰哲先后在畿辅中学和北师大附中读书。说一句题外话，北师大附中首任

校长竟是福州人陈璧，也是福州人的林纾曾任汉文总教习。小老乡张钰哲很给先辈们长脸，1919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附中毕业，并考上清华学堂高等科，那是晚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他前往美国，先后在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但苍穹的吸引力如此强大，1925年他断然转入芝加哥大学天文系，从此与星宿们不离不弃。他先后获天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被校方派往叶凯士天文台实习、研究，一些声名显赫的天文学家尽职此间。正是在那里，年轻的中国学者张钰哲，发现了一颗从未被人类记录过的新星。

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甚至是第一颗由亚洲人发现的小行星。

宇宙浩瀚，天文学多姿多彩的研究课题中，小行星们不可或缺。1801年1月1日，意大利天文学家皮阿齐观察到小行星列表排序第一位的谷神星（矮行星），时至1928年编号已达1124，但其中竟没有一颗发现者属于中国人，直至1928年11月22日记录被改写。那天夜晚威廉斯湾依然繁星闪烁，观测室的天文望远镜前，张钰哲连续拍摄下一幅幅天体照片，隐隐约约，底片上一个光点似乎从未见识，星图对照亦“查无此星”。接下来是连续15个寒夜的观测以及严格的轨道推算，可以证实果然是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

编号1125。被中国留学生张钰哲捕捉到的小行星从此纳入人类视野，按照国际惯例，发现者拥有命名权，他将其起名“中华星（China）”。

留学生涯即将结束，与其说他是思念起遥远的故乡，毋宁说家国情怀早已浸透他的血液，诚如他在《留美学业将毕寄诗呈母》中所言：“科技学应家国需，异邦负笈跨舟车。”

“中华星”演绎着戏剧性的传奇。1929年张钰哲学成归来，由于当时国内研究条件限制，惊鸿一瞥的它竟然逃逸不见，成为“丢失的小行星”之一。1957年10月30日，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和学生张家祥观测到一颗新的小行星，轨道与“1125”颇为相似，国际上破例以其代替消失的“中华星”。或者是不甘寂寞，旧版“1125”日后探头探脑复出亮相，名分却已花落别家，于是乎1988年它重被命名为“中国星（Zhongguo）”，编号“3789”。自此，“中华星”与“中国星”，两颗“中”字号小行星漫步苍穹，双星辉映。

张钰哲一生勤于天文观测。20世纪50年代在紫金山天文台，他虽身为导师且年长30岁，却坚持与学生轮流导星，每每一干通宵；南京的冬夜寒气逼人，身体几欲冻僵，钢笔水都凝结起来，只得以铅笔做记录。他长期致力于小行星、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工作，研究领域涉及行星物理、恒星天文、航天及中国天文学史等方面，195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在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工作中得到成功运用。他带领紫金山天文台的同人们，先后观测到1000多颗未曾记载的小行星及3颗新彗星，其中100多颗已登录星历表……



张钰哲在 60 厘米反射望远镜旁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

3. 中国境内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食观测

抗战时期中国大地硝烟弥漫，众多机构与院校纷纷内迁西南。1941 年元旦甫过，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钰哲，将老母、妻子和一双幼小儿女留在重庆，只身前往昆明，接替余青松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毅然决然的心情，从他赴任后寄给爱妻的生日贺词便可一窥：“圣战方殷，敢耽室家之乐？步天有责，难辞蛮瘴之行。”

步天有责。即便 1929 年留学归来执教于中央大学，“身在物理”的张钰哲仍执迷星空。他被聘为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宇宙》期刊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任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他的第一部天文学文集《天文学丛谈》、第一本科普作品《地球之天体观》……甚至托人从美国购回光学玻璃，

业余时间待在学校地下室设计、研磨天文望远镜。

历史将新的“第一”，置于天文研究所新任所长张钰哲面前——组织中国境内第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

悠悠中华，拥有人类文明史上最丰富的天象记录，其时却从未以现代方法组织进行日食观测。1941 年 9 月 21 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中国境内的推论引起世界瞩目，中国天文学会于 1934 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但此番太阳神行经之地，多被日军占领或笼罩着日机轰炸烟云，各国天文学家纷纷取消来华计划。长达数千公里，

“在国土范围内见食地带之长，殆为数百年来所仅见”的天象奇观，将完全由中国科学家们进行观测并留下科学记录。确定地点、设备置办、人员组织……诸事艰难，单说那必不可少的观测仪器——多方筹款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地平式望远镜，竟然在香港码头转运时被日机炸毁！重新订购已来不及，所幸张钰哲留有“后手”：事先便以旧器材改造出一架地平镜以备不测。

因陋就简自制仪器的拍摄效果想来不如新设备。但在网络上搜寻到的 80 多年前拍摄留存的诸多日食照片及影像资料，仍然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我们带往 1941 年。那一年中国境内首次日全食科学观测南北并进，西北观测队为主战场，张钰哲任队长。6 月 29 日，他带领队员们乘坐一辆 2.5 吨的卡车从昆明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西北之旅。一路艰辛。仪器箱铺上行李就成为“软席”；七十二转弯、吊死岩……“沿途覆

辙翻车者之踵接”；烈日、沙尘、暴雨以及卡车故障；更有日本轰炸机的空袭一路随行，有一次“二十七架敌机，嗡嗡然掠顶而过，继以轰然一声震耳欲聋，颇为车中之仪器担心”……

历经 40 多天长达 3000 多公里的跋涉，西北队终于抵达观测地点——甘肃临洮。即便在这个遥远的边陲小城，他们也遭遇到至少 5 次日机空袭。但日全食无可阻挡，9 月 21 日 9 点 30 分初亏如期而至，随之食、既、生光与复圆，张钰哲和队友们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 170 多项，其中包括当年少见的彩色影片！百姓们争相观看，电台将实况向全世界广播

日食观测成功的第三天，张钰哲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

从昆明出发没几天，张钰哲便已获知母亲病重，抵临洮后又收到病危电报。自小相依为命，他与母亲感情极深，但思虑再三仍坚持留队直至使命成功。斯人已逝，他只能发回一篇长长的祭文寄托哀思。家与国，都是他的心之所系，家国情怀始终是他生命的主旋律。返程途中他还做了一件事：动笔撰写并最终完成了论文《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刊登于美国著名的《大众天文学》杂志 1942 年第 3 期。

4. 从紫金山眺望四方

溯源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路径，闽人的踪迹着实令世人景仰。福州长乐人高鲁，1928 年



日食观测队在甘肃临洮拍摄日食时的工作照，左四为张钰哲

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他发起筹建中国第一个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且为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1929 年高鲁赴法国任公使，厦门大学的同安籍教授余青松接任所长，比肩世界的紫金山天文台于 1934 年建成。此后又一位福州人亮相，1941 年张钰哲赴任天文研究所第三任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 年天文研究所更名为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台长，直至 1984 年改任名誉台长，1985 年改任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

漫长的岁月中，张钰哲一直担当着中国天文学界主要领导人的角色。科研、教育、国际交流、科普、行政事务……新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处处可见他的心血与功绩。

一文难尽，仅叙其一。

1956 年，《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得以制定，其中张钰哲亲自草拟天文学部分，并召集专家学者们讨论修改直至审定通过。在这份标志着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的文件中，张钰哲提出了要在北京地区修建以天体物理为主的天文台。

天文学是一门基于观测的学科，在全国各地创建天文台、站，是张钰哲终其一生的愿望。他真正是倾力而为，参加中科院远景规划会议间隙，便迫不及待乘坐越野车前往京郊踏勘选址；选址中遇到问题，他向聂荣臻申述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他不仅将紫金山天文台的图书副本调往北京，且通报各国天文台，希望相互交换的学术刊物同时寄赠北京天文台……

人才最重要。他亲自写信恳切邀请旅居法国的天文学家程茂兰回国，并委其全权负责北京天文台筹建，从不干预其工作。福州籍中科院院士王绶琯，1952年身在伦敦时也曾接到张钰哲“笔迹畅雅、语言率直”的来信，“把我视为共赴祖国天文建设的同道。”王绶琯回国后先是就职于紫金山，后又调往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在张钰哲的推荐与鼓励下，一大批骨干力量从紫金山奔赴祖国四方。北京、上海、云南、陕西天文台以及南京天文仪器厂的建立，长春、广州、乌鲁木齐等人造卫星观测站的建立，都倾尽着张钰哲的关心和支持。中国天文台、站、厂的布局在多年创建中基本形成，张钰哲功不可没。

“星耀中华，风范千秋”。2022年2月举行的纪念张钰哲120周年诞辰会议上，曾任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台长的严峻，在发言时慨叹道：“现在大多数原北京天文台和国家天文台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北京天文台的初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十二年发展规划的产物，不知道张钰哲先生与程茂兰一样骑着毛驴参加选址踏勘，也不知道程茂兰、王绶琯、李启斌等三任台长是在张钰哲推荐下从紫金山天文台骨干人员中抽调过去建设北京台的——功成不留名。”

5. 德令哈的星空

1988年盛夏时节，一个名叫海子的青年乘坐绿皮火车途经青海省海西州的德令哈，望着夜色笼罩下的戈壁，诗人释放出难以抑制的情怀：“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假如那个夜晚他在德令哈下车，将会看到戈壁滩上的无垠星海；假如他迟两年来到此地，荒原上画作般宁静的几个巨大白色圆球将吸引他前往，那是已落成的德令哈天文观测站；假如他更早些比如1980年游历高原，八成会在格尔木遇见一群睿智的天文学家，他可以和他们一起，探讨康德最敬畏的“头顶上璀璨的星空”，畅谈宇宙无穷的奥妙，在哲思与遐想中彻悟人生。那么或许，这位曾经写下“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美丽诗句的青年，不会在25岁时投身冰冷的铁轨？

他们或许还可以一起，谈谈诗歌。

1980年的张钰哲，已是78岁高龄。78岁的

张钰哲率领一支专家队伍不辞辛劳前往高原，登上 4800 米的昆仑山口，是为我国建立第一座大型毫米波射电望远镜观测台选址，最后选定在德令哈市东的野马滩。高海拔使得来自外太空的电磁波轻松抵达，这里有着地球上最纯净的星空。同行者王绶琯曾作长诗《瀚海行》感叹：“昔随钰师视台址，纵横仆仆海西路；海西佳气接金陵，野马滩头业共树；为使观天镜更明，不辞荒原同朝暮。”

老一辈天文学家中多有诗人，年少时奠定的古诗词造诣自为底蕴，总感觉也因了星空赋予他们瑰丽想象与浪漫情怀。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前张钰哲特地到各处考察，《美洲天文台参观述记》以骈文描写所见所闻：“异邦羁旅，求葛六更，荒陬郊居，亦垂二载。问星移斗转，几阅人世沧桑，见银汉斜横，何日鹊桥飞渡……”至今读来仍回味无穷。多才多艺的张钰哲，不仅喜爱作诗，也热衷于绘画、篆刻，书房四壁挂着自己创作的水彩画、油画及素描。书柜中数枚印章也是自家刻制，包括一枚“钟山太史”（古代掌管天文的官叫太史令）、一枚“平子家风”（平子是汉代天文学家张衡的字）。不由想起闽都的花园路，那里曾经喧闹的寿山石市场，还有十几间车玉小作坊……

晚年的张钰哲依然奔走在观星之途，从不曾停止脚步。赴昆仑山口、云南凤凰山天文台、乌鲁木齐人造卫星观测站，出访美国在哈佛天体物理中心作题为《今日中国天文台》的报告……



1990年10月，中国邮电部发行第二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一枚为张钰哲纪念邮票

1982年，他的专著《哈雷彗星今夕》出版；1986年1月，时隔近76年哈雷彗星再次回归，他又一次得以目睹，在天文望远镜前激动不已。似乎是了却心愿，同年7月21日张钰哲在南京病逝，追随彗星远去，终年84岁。

“观河汉星辰，远溯鸿蒙探造化；究躔离仪像，相期月窟建灵台。”这是张钰哲书房长年悬挂的一副隶书自拟对联。期盼在月亮上修筑天文台的张钰哲，2010年在那儿有了安歇之处——月球背面的一座撞击坑，被国际天文联合会命名为张钰哲陨石坑。而早在1978年，为纪念张钰哲在天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将编号2051号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Chang”（张）。

写到这里，好似看到一位老先生高挑清癯的身影，正行走星海，以步测天。当他逡巡到东海之滨上空，会不会回眸远眺，那遥远的闽都，那些街巷那座小院……

刘崇乐与昆虫的故事

叶仲健

评价闽人，有“在家是条虫，在外是条龙”一说。假如虫子会说话，没准会发出抗议三连问：像条虫咋啦？像条虫很丢人吗？凭啥拿我们作对比？的确，昆虫，看似不甚起眼的一种小生物，若干亿年前便已在地球繁衍生息，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动物群体，目前已知高达100多万种，比其他动物种类加起来都多。

20世纪，福州出了个院士，专门以昆虫为研究对象，他姓刘名崇乐，字觉民，原籍福州，出生于上海，其曾外祖父乃大名鼎鼎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刘崇乐是中国昆虫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先驱者、中国资源昆虫学开创者，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学及化学专业，同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



刘崇乐

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副院长兼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昆虫学报》主编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作为一名昆虫学家，刘崇乐身上发生的故事当然与昆虫有关。

蚕

说到蚕，大抵会让人联想到“嫫祖养蚕”。远古时期，西陵部落一个叫嫫祖的公主，有一天在一株桑树下搭灶烧水，忽然，一阵大风吹过，一只蚕茧从桑树上掉下来，落进烧沸的锅里。嫫祖怕弄脏了水，用一根树枝去打捞，谁知一捞再捞，却捞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越拉越长。她用一根短树枝将丝线缠绕起来，绕成洁白的一团，遂产生了用这种丝线代替植物筋纺织的念头，于是又采了更多的蚕茧绕成丝线，动手一试，果真织出了一块白白的丝布，往身上一披，柔软又漂亮。嫫祖先是采集野外桑树上的蚕茧，后来就自己采桑养蚕，缫丝织绸，成为采桑养蚕的鼻祖。

“嫫祖养蚕”的传说，经考古发现，或许并

非杜撰。1926年，在对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一名考古队员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形似花生壳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个被割掉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部分已经腐蚀，但仍有光泽，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整。对此，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十分重视，邀请同校的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

1901年9月20日出生的刘崇乐，时年26岁，刚回国不久，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在静生生物研究所兼职。接到任务，他不敢掉以轻心，对李济送来的物体展开观察、分析和考证。该茧壳比当时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不在坑底，茧壳周围的土色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上面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表明这半个蚕茧被人为割裂过。据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致，并鉴定产自一种家蚕。

倘若这个结论正确，证明我国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但没找到第二颗，算孤证，难免会引起外界质疑。所以，公开之前，刘崇乐与李济等专家多次会谈，以确定结论的可靠程度，总的来说，他虽不敢完全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缘于刘崇乐的严谨，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关于“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也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思考方向，未做肯定的结论。

有关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土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渡重洋，传到世界各地。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蚕茧的孤证，引起中外考古学界相当长时期的争论，大家的观点见仁见智。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特意将这半个蚕茧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鉴定，证实了刘崇乐当初的判断无误。无独有偶，2019年，山西省夏县师村史前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也为刘崇乐的判断提供了佐证。

蝗虫及其他

蝗灾和水灾被视为农业的心腹大患，《诗经》有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在古代，蝗灾来袭时，往往遮天蔽日，方圆百里的粮食顷刻间被吃光。我国历史上蝗灾迭起，据《中国飞蝗生物学》一书统计，近代以前中国的2000多年里，大规模蝗灾达804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最严重莫过于明崇祯时期。崇祯九年（1636）蝗灾初起，到崇祯十一年（1638）蝗虫从徐州到关中平原，从山东到北京，蔓延千里，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随着干旱面积的扩大，蝗虫蔓延至长江黄河流域，明朝的覆灭不能说与之无关。

留美期间，刘崇乐主要从事橘叶蛾生物学、环境因子及寄生现象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

国的生物学界和农学界，包括昆虫学在内的大部分学科尚处在需要填补空白的拓荒阶段，回国后的刘崇乐想马上开展研究是不可能的，只能先和相关文献和专业文献，包括有用的图书、资料、期刊，乃至标本、切片等基础条件上下功夫。在此基础上，秉着科学救国的初衷，他决定对昆虫病害防治展开研究，尤其蝗虫病害防治领域的研究，这对国民经济建设极具意义。尽管当时有机氯杀虫剂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单靠药剂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问题，还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环境污染。刘崇乐认识到，只有以虫治虫，搞生物联治，才能避免环境污染和害虫抗性，让生态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20世纪30年代起，刘崇乐着手搜集资料，先后开展了以里缘江瓢虫防治杏球蚧、黑卵蜂防治松毛虫等一系列试验，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编纂一部世界性的天敌昆虫文献目录。直到加拿大W·R·汤姆孙的相关专著于1943年问世，他才不得不放弃这项工作。放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意味前面十几年走了冤枉路，但科学就是科学，需要超越和创新，既然有人走在你前面，你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毋庸置疑，刘崇乐十余年的耕耘并非都是无用功，至少为我国生物防治事业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刘崇乐投入到飞机灭蝗研究工作中，将现代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为我国1949年后治蝗灭蝗首立战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1953年，他在中国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创建了生物防除研究室；1954年，他接受农业部委托，投身研究危害严重的黏虫防治，得出东北春末第一次出现的成虫很可能是从南向北迁飞的结论，这个结论经深入试验被昆虫学界公认，仅冬春两季在东北不必兴师动众去挖冬蛹即可节省大量劳力；1958年，他从国外引进苏芸金杆菌，在防治松毛虫、菜青虫等害虫方面获得成功；1964年，他主持召开全国生物防治座谈会和食虫微生物座谈会，掀起生物防治研究的高潮。

蝉

蝉夜间会不会叫？读过《荷塘月色》的人，大抵记得朱自清笔下的月下荷塘：“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陈少白的读者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在夜里是不叫的。就这个问题，朱自清特意写信请教同事、昆虫学家刘崇乐。刘崇乐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回忆过往，似乎还真没听见蝉在夜间叫过。当然，作为一名昆虫学专家，不能仅凭主观经验轻易下结论，他询问了身边不少人，有的说会叫，有的说不会叫，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彼时不是盛夏，他无法通过实地观察获得答案，就算恰好是蝉出没的季节，没听见蝉在夜间叫，不代表所有的蝉夜间都不会叫，

需要将此作为课题进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和研究，眼下这种情况只能翻阅书籍查证。

几天后，刘崇乐拿出一段抄文对朱自清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抄文的大意是：平常夜晚，蝉是不叫的，但有时也叫。朱自清本可用此抄文答复读者，可转念一想：刘先生是谨慎的科学家，关于此问题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啊！于是他回信告诉陈少白：自己请教了一些专家，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感谢他的质疑，并表示以后再版，将删掉有关“月夜蝉声”的句子。

哪知到了抗战初期，陈少白又在《新学生》月刊上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不仅引用了朱自清的回信，还引用了王安石《葛溪驿》中的诗句：“鸣蝉更乱行人耳。”这些年，朱自清因为“有这切己的问题在心里”，特别关注并力图求证这个问题，曾两次亲耳听到月夜蝉声。因不知陈少白地址，朱自清专门写了篇题为《关于“月夜蝉声”》的文章公开作答。文中，他感慨地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只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我自己在这儿是个有趣的例子。”由这件小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科学的实证精神。

朱自清的这篇公开作答，刘崇乐是否看到，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答复朱自清那句“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和未经实际研究不做明确表态的做法，一如“半个蚕茧”事件，表明了他学风严

谨、做事认真的态度，这正是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可贵品质：对于存疑的事物，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都应该坚持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实践中去检验。

苍蝇、蚊子、蚂蚁及跳蚤

1951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给号称世界最大的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以沉重打击。为挽回失败，美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通过投放感染了鼠疫、霍乱的苍蝇、蚊子、蚂蚁、跳蚤等昆虫，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大规模细菌战，企图制造疫病流行，削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有生力量，为或将进行的停战谈判施压。

1952年1月27日晚，朝鲜铁原郡金谷里出现美军飞机，次日早上志愿军战士在寒冬腊月的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等昆虫，有悖昆虫生存常理；1月29日起，志愿军其他部队也接连发现了类似情况；2月17日，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郡下甲里投下炸弹爆炸后留下大量苍蝇，官兵们目击了整个过程；2月29日至3月9日，我国东北和青岛也出现了此异象，朝鲜还出现了鼠疫、霍乱等重大传染病，13名朝鲜人染上霍乱，不治身亡的9人。

当确认美军对我方实施细菌战后，朝鲜外务省和中国外交部于1952年2月22日和24日先后

发表声明，抗议和揭露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暴行。慑于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拒不承认进行了细菌战，对中国人民的指责矢口否认，还组织人员从学理上进行辩解。

党中央在毛主席指示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防疫委员会和一个70多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刘崇乐是其中的主要专家之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工作人员冒着随时可能被病菌感染的风险，抓捕携带病毒的苍蝇、蚂蚁、老鼠和跳蚤等进行化验和研究，以搜集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有力证据。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的率领下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1952年，作为特邀代表，刘崇乐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上向世界人民控诉了美帝这一行径，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得以昭示世人。

紫 胶 虫

紫胶虫，属于昆虫纲、半翅目同翅亚目、胶蚧科的一种，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及斯里兰卡，在中国分布于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湖南、台湾等省区。紫胶虫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昆虫，寄生在植物上，靠吸取植物汁液为生，雌虫通过腺体会分泌出一种纯天然的树脂——紫胶。

紫胶又称虫胶，是由多羟基脂肪酸和倍半萜烯酸组成的一种聚酯混合物，被广泛用于医药、军事、机械、皮革、造纸、油墨、食品等行业。历史上，我国紫胶生产技术薄弱。据《吴录》所载，紫胶的产地是九真移风果，即今越南中部的清化省；《酉阳杂俎》所载的产地为真腊、波斯、昆仑三国；唐代末年李珣著《海药本草》中引裴渊《广州志》指出紫胶产自海南；苏颂根据《交州地志》说交州亦为产地之一；李时珍说产于南番。综上所述，我国虽出产紫胶，但可能由于技术或交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让人遗憾的是，我国本就薄弱的紫胶行业，自1930年前后逐渐停滞，到1945年完全停顿，所需紫胶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乃至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尤其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进口更是变得十分困难。

靠人不如靠己，国家决定深入开展紫胶技术

研究。缘于1943年曾接受清华大学和云南经济委员会的专员之聘飞往印度考察紫胶的经历，1955年至1958年期间，年过半百的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中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开展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

通过生物考察和试验研究，刘崇乐发现我国胶虫寄生植物非常丰富，认为可以发挥我国幅员辽阔和气候多样的优势，根据各地测定资料及试验研究，因地制宜择优充分利用。在他的领导下，云南景东设立了紫胶研究点，北京也成立了紫胶研究小组，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了一系列胶虫生理、生态、生化及遗传等方面的研究，总结出胶虫及其寄生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及适宜它们生理生态的最佳条件，获得限制胶虫截止于冬的生态因子科学数据，为紫胶虫的放养、产区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刘崇乐出任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的第二年，昆明虫胶厂成立，采用手工法生产片胶。十年后，该厂扩大了规模，实现机械化，生产粒胶、溶剂法片胶和热溶法片胶。到20世纪70年代，虫胶厂发展到数十家，生产的紫胶批量出口国外。时至今日，我国紫胶及相关技术跨进世界先进行列，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云南成为我国紫胶原胶产量最大的区域。

开展紫胶虫研究的同时，刘崇乐亦没有忘记同样意义重大的基础研究，将目光投向一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昆虫——瓢虫，除此之外，斑



刘崇乐收藏的部分世界瓢虫标本

蝥、寄生蜂、寄蝇、蜘蛛等也是他的研究对象。在云南考察生物资源期间，他还将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

刘崇乐一生学术成果颇丰，先后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专著6部，译著2部。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授予的院士，1958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此后在一些同志的协助下编写《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五册“鞘翅目一瓢虫科”，为我国瓢虫科昆虫系统分类奠定了科学基础。

诚如开篇所言，世界已知昆虫100多万种，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未知昆虫有待人类去发现和认识，昆虫研究是一门始无尽头的科学。1969年1月6日，带着重病之躯和未酬之志，刘崇乐逝世于北京，享年68岁。在他身后，诸多致力于昆虫研究的科学家们，仍继续前行在通往大自然的漫漫长途，探知更多昆虫的秘密。

书坛留痕

——乌山图书馆始末

萨本敦

在福州白马北路西边，沿河是一条亮丽的绿化带，到了乌山小学对面，绿化带扩展为一个绿树婆娑的公园。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里本是有两座楼房、前临路后靠河、带有园林色彩的乌山图书馆。虽然这座为保存文献做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后改为省幻灯厂，又在十多年前城市改造中彻底推平为公园，但仍有老人记得当年它独特的建筑和在那里读书时的快乐时光。由于我的父亲萨兆寅自建馆起就供职其中，把一生献给了图书

馆事业，耳濡目染的我对乌山图书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怀有他人不一样的情愫。

1. 乌山图书馆的建立

1929年，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建学院。当向政府申报时，教育部指出必须具有校舍、基金等一系列条件才许可立案，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其时“法



白马河公园今景

专”仅有数百册图书，要想在短时间内建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是不可能的。学院董事会聘请何公敢为院长，他想出一个主意，即建一座具有双重性质的图书馆，它既是福建学院的图书馆，又是对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这样就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接受赠书。其时我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归国已8年，他一边参加“新文化运动”，一边在北平、上海间奔波谋生。我奶奶的姐妹嫁到何家，何公敢算是我家的亲戚，一日何公敢在上海偶遇正在谋职的我的父亲，就邀请他回福州筹建图书馆。

馆舍在建时，学院的图书馆暂设于“奉直东会馆”内。新馆由福州著名建筑师林天民设计。林天民的兄长林长民1925年在东北参与讨伐张作霖的战事中身亡，林天民为其收骨，并将林长民藏书数千册运回福州，计划待乌山图书馆建成后悉数捐赠，故后来林天民亦以捐书人的身份成为该馆董事会的董事。



林天民

林天民不愧为名家，设计的主建筑物一边是钢筋水泥的书库，一边是砖木结构、宫殿式檐口的阅览厅，中隔以梯房，两边均两层，中间三层。所用砖木材料大多是从旧城墙和米仓拆卸而来。大门两旁的石栏石柱是用从万寿桥和津门城楼上拆卸下来的石栏、石狮凑配而成。在当年，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十分少见，而总造价只万余元。

林天民在福州的建筑作品还有东街口的文艺戏院，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八一礼堂，20世纪90年代拆除。有人说这座戏院是林徽因设计的，此说不确。1928年林徽因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回到福州，林天民曾推荐侄女为文艺戏院设计，但林徽因坚持由叔叔设计，自己辅助，所以文艺戏院的设计师应为林天民。

图书馆1930年秋动工，1931年春建成。因为螺洲陈宝琛家捐献了大量图书，何公敢请其为馆命名，在北京的陈宝琛听说图书馆建在乌石山



1933年左右拍摄的乌山图书馆（林轶南收藏）

麓，就把它命名为“乌山图书馆”。

1931年4月6日，新建的乌山图书馆开放。同年成立董事会，由学院推举郭公木、郭苾民二人为代表学院的董事，又从捐款捐书人中推举何公敢、林天民、刘雅扶、陈几士、林谦宣等5人为董事，图书馆的具体工作则由我的父亲萨兆寅负责。

2. 来自社会的捐赠

乌山图书馆在社会上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在于它收藏有大量图书。这些图书主要来自福州名门望族中的藏书家，其中不少为珍籍善本；另外，一些团体也捐赠了部分藏书。

私人捐赠藏书首推螺洲陈宝琛，他祖上便积藏了丰富的图书，建有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和曦楼，合称陈氏五楼。乌山图书馆成立后，陈宝琛之子陈几士将藏书的一部分约一万余册捐赠。大多是类书、丛书和基本通用图书，其中有很多珍本。可以说，乌山图书馆藏书主要是以陈氏捐赠的图书为基础而增益补充起来的。

林长民之父林孝莼为清翰林，父子二人藏书颇丰，存于北京寓所双括庐。林长民逝世后，藏书由其弟林天民自北京运回捐赠，约有数千册，其中珍贵的版本不少。

家居衣锦坊的林葆恒、林葆忻兄弟二人有藏书楼棣华山馆，其捐赠的多为先世林绍年遗藏，

有八九千册，亦以丛书为最多。

此外还有刘鸿寿的景屏轩藏书，颇多精本，由其子刘勉己捐赠；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的耕心斋藏书，在他逝世后也移藏乌山图书馆；林则徐后人林楚秋藏书、闽侯螺洲陈常贤藏书均有千余册捐入。

除了以上古籍外，何公敢捐赠了日文书数十箱，刘勉己捐赠法文书数十箱，林值夫、刘爱其、庄哲生等各捐赠了新旧中外图书。

团体的赠书主要有：

福州藏书楼。1905年福州爱国人士掀起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发起“说报社”宣讲时事，并附设藏书楼以启发民智。藏书楼仅3个月即征集藏书4万册。后藏书楼停办，图书储在南台商业研究所中。乌山图书馆成立后，藏书楼所存图书便移馆收藏。

福州阅书报社。晚清有一帮社会热心人士组织了设在福州塔巷内的阅书报社。他们搜罗各种报纸杂志及说部丛书，供众阅览，由林炯轩先生负责管理。1926年林先生逝世后停办。乌山图书馆成立后，林氏后人将所存图书报刊移赠，其中多种报刊绝版已久，弥足珍贵。

北京晨报社。北京晨报社在五四运动中影响颇大，停办后其藏书及出版物由刘放园、林仲易两先生运来福州，藏入乌山图书馆，其中以《晨报》自创刊至停刊全份最为珍贵。

“一六”图书馆。“一六”图书馆是1930年福州“一六政变”时被土匪卢兴邦绑架去的省府

委员林知渊、郑宝菁、许显时、程时燧和水上公安局长吴澍等人被释后创办的，设在福州西湖，仅仅昙花一现，后所藏并入乌山图书馆。

3. 多彩的文化活动

乌山图书馆内砌有漂亮的假山，它迁自前清提督署。清乾隆福建学政朱筠，曾让学子一人一石共集 333 块，在提督署内垒座假山。乌山图书馆的假山石就是从这里移来；提督署还有部分假山石则移到了福州西湖公园。

何公敢还亲手植了梅花数十株，图书馆俨然成为一座园林，书香伴花香，常有蜂蝶落在书上。这里不但成为学生最喜爱的地方，而且是文人雅士聚会的首选。

父亲曾收藏一幅《乌山白水图》，那是一群当年福州的名流在乌山图书馆里集体创作的，有的画山水，有的画花草，有的画亭台，作者既有前清遗老，也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锐青年，每位作者均有题诗。我对此画非常喜欢，父亲对我说，他想题一跋，续在画后一起装裱，可惜此画焚毁于 1966 年夏。

1932 年，乌山图书馆旁又建一座楼房，为乌山图书馆与中华学艺社福州分社共同使用。当年暑期在此举办了著名美术家王济远画展。王济远早年在江南画坛已声名大噪，与画家张大千、潘玉良等相往来，并加入由刘海粟创办的西画团体天马会。由于王济远既擅中国画艺和书法，又擅

西洋水彩和油画，其画展盛极一时。

引发市井百姓兴趣的是电影明星胡蝶到乌山图书馆赏梅。1935 年 11 月胡蝶和上海实业家潘有声结婚，潘有声原籍福建莆田，婚后他们回莆田拜望乡亲，无奈路途不靖，只好留在福州仓山与亲友会面。1936 年初春，乌山图书馆数十株梅花盛开有如香雪海，游人络绎不绝，胡蝶听闻，意欲观赏，乌山图书馆得知，提前作了宣传，胡蝶赏梅当天，馆内外人山人海，轰动榕城。

1936 年 2 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从杭州到福州游览，被陈仪委任为省政府参议。欢迎郁达夫的座谈会、讲演会也在乌山图书馆举行。而其他学术团体借在馆内开会的更多，故福州文化界人士对乌山图书馆都有深刻的印象。

乌山图书馆董事、诗人、藏书家林谦宣的《乌山图书馆纪事诗五言排律十六韵》，对图书馆有很细致的描述：

“东越图书府，南城鼓角楼。春明坊可拟，天禄阁相侔。举国犹兵马，窥边急寇雠。武功何日偃，文献及时修。好古来多士，专诚比列侯。厨藏中秘赐，书向世家求。编订分千目，收罗暨五洲。海天思俶落，蠹管愧咨諏。白水铉歌满，乌山草木稠。树人宜早计，览世抢先忧。花韵双骖迹，钟声积翠遒。豹屏新径辟，狮石巧工留。添种梅千本，移栽石一丘。登高襟左海，望远控邻州。旗鼓东西峙，台洪日夜流。秉兹灵秀气，坐待栋梁收。”

4. 书坛上的留痕

乌山图书馆落成后，福建学院任命我的父亲为主任，全盘负责馆务。（院长何公敢挂名为馆长）接手后我父亲集中精力于图书编目。他编制了两期书本目录，并铅印发行。须知这是非常艰辛费力的工作，当时国立、省立各大图书馆都没有进行这项工作，而乌山图书馆却最早做到了。

另一项工作是办附属于日报的《图书馆学》周刊，周刊延续了几年。其时正是国难当头，周刊上发表了诸如《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日本满铁图书馆事业及其侵略东三省的力量》《救国运动与图书馆的责任》等抗日救亡的文章和书目，并介绍福建地方志及善本书。在日报上开辟《图书馆学》周刊成为全国的首例。



作者父亲萨兆寅工作像

当年，我的父亲不过30岁，同在馆里为馆员的七叔萨照远也才20岁。七叔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常在馆内聚会并成立了“青年文艺社”，社员有五六十人。他们靠辛泰银行及虎标万金油的广告费和自己部分出资，出版了文学刊物《磐石》。《磐石》虽只昙花一现，但在福州文学史上却留下一抹亮色，成为图书馆的珍藏。

一些进步青年，如邓拓、傅家麟、章振乾、沈祖牟等都是馆中常客，和父亲结为挚友。父亲曾说，他痛恨反动政权的腐败，“救国必须抗日，自由必须倒蒋”成了他的信条。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闽举起反蒋的旗帜，成立人民政府，父亲积极参与，被任命为省立图书馆馆长。12月，十九路军兵败，父亲才退回乌山图书馆。

父亲嗜书如命，抗战期间，福州两次沦陷，他携乌山图书馆的书搬迁到闽清白云渡。其时他有七律《携家避兵闽清作》：“十年僵卧作书蟬，忽向林峦深处探。枕石溪旁疑急雨，驰车山际逐幽岚。危城未破归犹阻，尽室偕行梦欲甘。行李乱抛何所惜，一肩乡献愿能担。”诗言志，此乃父亲真情的流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而私立乌山图书馆也并入了省图；那些被我父亲视若生命的图书终于回归人民，让他喜不自禁，倍感欣慰。堂伯萨伯森曾有赠诗“万轴牙签拥一身，老当益壮奋精神”，它正是其时我父亲心情的写照。

风光抑或谍影

——福州近代影像发展述略

平 之

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正式宣告摄影术的诞生。同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亦称碘化银法）。三年后即1842年，随着中国门户被渐次打开，摄影术由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等传入中国。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在澳门、广州拍摄数十幅银版照片，记录下首批中国影像，其中一张为两广总督耆英像。而到目前，晚清最先记录摄影术的汉文著作则是成书于1849年的《西海纪游草》。该书作者林鍼（闽县人，随父迁居厦门），曾赴美国教授中文，遍游美国南北各地。1849年回国后，写就著名的《西海纪游草》，记述了自己在美国的教学生活和见闻，以大量篇幅介绍美国的教育，特别是科技、工艺、医院、交通、通信、建筑，对美国的博古院（博物馆）、盲人院、养老院、报纸等也有简略的记述。他还从美国买了一架“神镜”即银版照相机带回厦门。

1. 从阿芳、谢芬到汤姆逊

赖阿芳（约1839—1890）又名黎阿芳，英文名Lai-Afong，广东人。1859年，他在香港开设了阿芳摄影社，获得商业成功，并持续经营了82年之久。赖阿芳兼具艺术和商业才能，摄影水平高超，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审美形式。他还曾雇有一名葡萄牙人协助业务。英国摄影家汤姆逊认为他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所摄多为香港和广东的风土人情，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纪实摄影。他于1869年或1870年拍摄了福州与闽江照片，是迄今为止首位拍摄了福州风光照片的中国摄影师。

而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州，舍恩克（？—1889）、同兴和宜昌照相馆则是目前有照片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三家照相馆。舍恩克开办的照相馆



《福州市郊的长桥》，阿芳相馆约拍摄于1869年

从1862年一直经营到1889年。1864年，S·辛迪也开办了一家照相馆。此外，19世纪60年代到过福州的外国摄影家还有桑德斯、威廉·普莱尔·弗洛伊德等。桑德斯，英国摄影师，于1862年在上海开设了森泰照相馆，《上海新报》曾刊登其营业广告。而威廉·普莱尔·弗洛伊德则是1867年抵达香港并创办了辉来照相馆，1872年才离开香港。

1851-1861年间，广州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一同到香港合伙经营油画店，随着摄影术在香港的逐渐兴盛及对绘画的逐步取代，三人预感照相业将会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再加上摄影和绘画有相通之处，便决定转行开办照相馆。他们出资请外国兵营里懂摄影的人传授技术，学成后又各投资200银圆置办了摄影器材，然后将油画店改为宜昌照相馆共同经营。几年后“宜昌”发展壮大，已是一馆不容三虎，于是三

人分道扬镳，各谋出路。周森峰仍留在香港继续经营宜昌照相馆，张老秋回到广州开办宜昌照相馆，谢芬则转战福州，将谢芬相馆开设在中洲岛江南桥桥头，除了拍照，还给人肖像绘画。

同兴相馆在19世纪60-70年代拍摄了福州和闽江一带的风景照片，包括一幅六联张福州马尾造船厂全景图，约摄于19世纪70年代。



1872年，同兴照相馆拍摄的闽江中大屿岛中的福建水师圆山水寨图

约翰·汤姆逊（1837-1921），英文名 John Thomson，是近代纪实摄影的先驱，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1837年，他出生于英国爱丁堡。1868年，汤姆逊第二次来到亚洲，居住在繁华的香港。在这里，他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几次短暂前往广东。而汤姆逊最为重要的中国之旅始于1870年，为时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从广东进入福建，然后游历了华东和华北，并到达了都城北京；1872年，汤姆逊结束了在中国的旅行，经中国香港回到英国。翌年，他出版了《福州和闽江》，随后又出版了《中国与中

国人影像》。他的拍摄角度与风格，注定了其作为“街头摄影先驱”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在世界摄影史上，约翰·汤姆逊被誉为“第一个以整个社会为主题”的摄影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摄影集。约翰·汤姆逊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首席摄影教师，培养了新一代的摄影旅行者和探险家，其中包括伊莎贝拉·露西·伯德。19世纪70年代，在福州传教的贾斯图特·杜列特即卢公明（1824-1880）仿效汤姆森《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的插图形式，出版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使自己在世界早期摄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1871年他曾陪同汤姆逊从福州出发，沿闽江而上200里拍照旅行。他在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一书中还编入了摄影术语。

帛黎（1851-1918），法国人，一位业余摄影师。1869年抵达福州，在法国驻福州军械处即马尾船政艺圃任教师。1874年，他正式进入中国海关，1876年，任北京同文馆教习，1886年被调往朝鲜海关。1888年回华，任北京税务司署襄办汉文案副税务司，1901年，在总邮政司赫德底下任大清邮政总办。1911年，邮政成为独立机构，他担任邮政会办。帛黎在华居住45年左右。1916年返回法国，两年后去世。（《清史稿》有传）其早期作品流传甚少，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布洛涅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藏有帛黎在1900年之后拍摄的照片底片，作品有《北京国子监琉璃牌楼》《观水法旁的西洋门》《圆明园》。帛黎还曾编写了汉语教材和语言工具书《铅槩汇存》，1879、1880

年曾先后将《圣教广谕》和中国古代小说《二度梅》翻译成法文出版。

1860年10月，美国人特德·法兰西斯·琼斯在福州开办茶行，经营武夷岩茶、茉莉花茶，逐渐成为在福州赫赫有名的埃奇公司总经理，并在福州成家立业。琼斯爱拍摄福州的风景照。最初，他只是从洋人摄影师那里购买福州古建筑照片。后来，他干脆聘请摄影师，人挑肩扛摄影设备到北岭、鼓山、闽江沿岸，拍下一帧帧他认为优美的照片。1860年，他从乌山西麓拍摄了明代古城墙。1870年，金山寺进入了老琼斯的镜头。



琼斯拍摄的明代古城墙

2. 木村的庐山轩：闽海的风光和谍影

近代，日本人木村信二夫妇创设的庐山轩照相馆曾对福州照相馆业产生深远影响。1885年，

木村夫妇在仓山大岭顶斜对着梅坞路的地方开设了庐山轩照相馆，但实为日本人的情报站，大岭顶所处的仓前山一带先后设立有 17 个国家的领事馆，教会学校、医院以及洋行也多集中在这里，有较多的摄影需求。木村夫妇在福州招收中国人为学徒，先后有杨连馨、陈岳甫、陈淑和、游步仁、游裕裕、游学美、马锡源等十余人成为他们的第一批学生。

日本人木村教导他的学徒要“拍人所好，因人制宜”。少年儿童要拍出天真烂漫；姑娘要拍出妩媚；中年少妇要拍出艳丽；老年人要拍出福气慈祥；大官要拍出威严；儒者要拍出文雅、潇洒。木村可算是照相业中的有心人。庐山轩的照相场地，使用幕景为背景，远景绘有园林竹木，近景则配有茶几、花盆或立体栏杆台柱等物为道具。庐山轩的开业为前清福州的人文景观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诸如马尾船政学堂（1866 年）、海军学校、英华书院旧址鹤龄楼（1881 年），以及教堂、钟楼等景物的外貌。清末文儒一辈，长袍马褂，拍照时喜欢左手托水烟筒，右手执“纸媒”，脚穿布袜、布鞋，留着长发辫，做休闲吸烟之状。福州“老诸娘”发髻上插有三条簪的打扮等都曾有留影。1901—1907 年间任福州东瀛会馆会长兼日本领事馆书记官的外交家、汉学家野口多内（1876—1949）旧藏关于福州历史人文的两册近代史、外交史博物馆影集，册内收录了其在任期间的政治、外交、生活活动旧影共计 180 幅，这些历经百年的影像构筑了庚子事变

后清末新政期间福州、福建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缩影。相册主要内容摄于 1903—1905 年间，绝大多数照片就是由庐山轩照相馆摄制的。

仓山庐山轩和城内庐山轩培养的众多学徒随后成为福州照相业的骨干力量。“镜中天”“宜华”“二妙轩”“明星”“时代”“会英”“光华”“月宫”等，这些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享有盛名的照相馆，都有庐山轩的学徒背景，也许这就是福州照相馆人像的拍摄风格比较接近的原因。由杨连馨、游学美、马锡源合办的宜华写真馆地处南台中平路河墘街，这里靠近码头，南来北往的商品在此交易，茶楼酒肆林立，花街柳巷云集，是福州的“十里洋场”。20 世纪前半叶，这条不长的街道上聚集着“宜华”“心心”“华洋”“开明”“美华”“新潮”“影星”“小美”等十多家照相馆，1910 年宜华写真馆在此处开店。1942 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宜华照相馆歇业，1943 年重新开业。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宜华照相馆拍摄的人像

1910年前后，庐山轩黄巷店（即庄心波开办的“镜中天”）学徒出身的高准亭在南街塔巷口开设了二妙轩照相馆，曾为莅榕的孙中山、邹韬奋等名流照相。1937年左右，相馆转让给曾兆斌。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中美照相馆，1949年以后又改为青年照相馆。月宫照相馆（麦园路33号）原主人史大昌，也是庐山轩照相馆学徒，提出月宫照相馆“照片50年不褪色”的口号，以当时最好的柯达底片配以新式相机，颇受欢迎；据史大昌后人回忆，每隔两三年，史大昌都要前往上海采购新式相机，仓山第一架三脚铁座照相机就是月宫照相馆率先使用的；店内另有专门一间用来陈设相机。公私合营后，史大昌之子接手月宫照相馆，后调至艺光照相馆，并工作直到退休。月宫照相馆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关闭的。战后，高鸿逵曾在福州办有东南照相馆，后到台湾开设过照相馆。

3. 其他海外旅行探险摄影家与福州之缘

随着汤姆森照片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领事、海关职员、洋行雇员、旅行家、摄影家来到福州和闽江流域拍摄。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1831-1904），1831年10月15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她冲破女性不宜长途旅行的观念束缚，22岁就开始旅行。她最早来中国是1878年，1878-1896年期间她大部分时间是在亚洲旅行。44岁才成为一名旅行作家——

那时女人没有把作家当作职业的。50岁结婚，直到60岁才进入摄影领域。1895年1月她再次前往汉城，2月去了香港，此后的4个月时间去了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定海。福州的影像收藏在其摄影册《伊莎贝拉·伯德中国影像之旅1894-1896》里。

威廉·埃德加·盖洛（1865-1925），又译盖尔，美国旅行家、作家、人文地理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顿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受过地理学专业训练，其旅行足迹遍布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1903年首次来华，从上海溯流考察长江流域人文地理，撰成《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次年出版。1908年完成对长城的考察。1909年起又游历了中国内地各省府及五岳名山。在中国考察期间，他大量摄影并收集各地方志和地图，陆续出版《中国长城》《中国十八省府》（1912年）、《中国五岳》。福州在《中国十八省府》中位于杭州之后作为第二章介绍，涉及福建畲族的祖先传说和畲民的服饰，对畲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了一定的介绍。福建的诗歌和通俗散文，特别是“药府”传说与民间歌谣成为他关心的课题。

海关雇员爱德华·邦斯·德鲁（1843-1924），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1865年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工作，1868年至1908年曾任福州和宁波海关税务司，中国人称他“杜德维”（1902年至1904年任福州税务司）。在中国任职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北

京、福建、江浙、上海、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风景人文。

胡安·门卡里尼（1860-1936），中国海事海关的西班牙雇员，集邮家、摄影师和后来的商人。胡安是1881年至1912年间西班牙皇家海关的一名雇员，是西班牙重要的业余摄影师，是第一个通商口岸外国摄影师协会的创始人。1891年他随家人来到福州，一年后，他参与创办福州摄影社，重复了往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摄影社的经历。门卡里尼与法国驻福州领事欧内斯特·弗兰登合作，创作了一本关于该地区风俗和人类类型的相册。

莫理循（1862-1920），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1894年，莫里循来到中国，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游而上，开始了他第一次在中国的旅行。他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912-1920年）。他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

希姆森，也译为谢弥沈、禅臣，是德国汉萨同盟城市驻福州的领事，同时也兼任瑞典副领事。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他于1894年发起组建了福州摄影俱乐部。他也是禅臣花园（今时代中学仓山部）的主人，德国驻福州领事。

唐纳德·曼尼（1876-1941），英格兰商人，业余摄影家，20世纪早期曾在中国生活、任职。据1891年4月保留的一份人口普查档案显示，15岁时，曼尼是一名药剂师的助手，与两个弟弟詹姆斯、亚当以及作为家庭户主的兄长阿奇博尔德·雅戈居住在苏格兰北部旧郡萨瑟兰德戈尔斯皮。他于1899年来到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定影药水正是屈臣氏提供的，因此其影集由屈臣氏大药厂出版，《中国的南与北》影集里有福州的老照片；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加入公共租界中的准军事组织上海义勇队，保卫公共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由于他在当时上海街头拍摄过日本军队的暴行，被抓入上海龙华集中营。据研究上海集中营的美国学者莱克在《帝国的俘虏：



莫理循拍摄于1870年的福州泛船浦前街和天祥洋行办公楼

日本在中国与香港的集中营》一书中介绍，唐纳德·曼尼在1943年3月进入龙华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使已年近70的他健康状况恶化，随后被转移到医院治疗，不幸于1944年1月在上海去世。唐纳德·曼尼善于采用逆光拍摄，他坚守传统的湿版摄影工艺，作品为20世纪初极具个人风格的画意摄影佳作。他并不注重特定内容，但十分注重拍摄的角度和画面的效果，无论是晨雾、湖泊、江河、风光，还是桥梁、街市、胡同甚至灰尘漫天的篷车队，都十分注意光影、质感与层次，喜好侧逆光，作品呈现着朦胧而细腻的独特美感，有些照片还具有国画般的情趣，可以作为中国文人画意摄影的参照物，让人们感受东西方摄影文化的差异，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是商人摄影师的还有乔治·沃伦·太古(1883-1949)，他从1904年起是其父亲公司的伦敦合伙人。每隔3-4年，沃伦·太古都会到中国检查公司的运营情况，咨询当地管理人员，并会见外交官、官员和商业伙伴。太古最大的子公司是太古航业公司。1906年至1940年间，太古定期访问这些口岸城市的子公司。沃伦·太古是一位敏锐而精通的摄影师，他的照片似乎是为了构建太古在中国活动基础设施的视觉备忘录。

西德尼·甘博(1890-1968)，生于美国，其祖父是宝洁公司创始人。1908年，18岁的青年甘博随父亲来中国，1909年任闽海关税务司。他曾四次到中国，对华北社会有研究，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非职业摄影师。1922年秋，他与燕京

大学神学院的教师步济时一起创建了燕大社会学系。他们合著的调查报告《北京社会调查》也在美国发表。五四运动时期，甘博进入临时监狱拍摄被关押的学生，成为迄今了解被捕学生生活的唯一一组照片。1925年4月2日，他还完整地拍摄了孙中山先生大殓。甘博游历中国西部地区，拍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美国杜克大学藏有的照片4674张，记录了民国初期(1918年左右)福州的风光、连家船航运状况、盲童学校日常上课和活动的景象，还有盘三叉发髻的女子、打扮考究的人物和衣衫褴褛的乞丐等。



盘三叉发髻的女子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德国建筑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古建筑宏伟的外观、精巧的布局、高超的工

艺水准深深打动了这位初到东方的德意志青年。4年以后，这位名叫恩斯特·伯施曼的青年人重返中国，开启了长达4年的中国建筑考察之路。从1906年到1909年，他走过了平展无垠的大平原，跨过了滚滚的黄河、长江，在一座座城市、一条条山道上找寻最好的中国古建筑。回国后，伯施曼出版了《中国建筑与景观》一书，里面有288幅摄影作品，内容涉及中国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共12省，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各地的建筑、风景、文化及日常生活。

20世纪20年代来到福州的国际摄影家还有美国的汤姆逊·希拉、亨利·法兰克、纳福·格尔登，法国的丘希尔·法拉韦尔斯、保罗·克洛岱尔，英国的辛希勒·约瑟夫等。日本人也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影像采集，包括福州和闽江流域，为其侵华积累了大量地理知识和情报。

日本间谍岛崎役治生卒年不祥，只知道他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情报人员，其公开身份是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记者。此人于1924年至1932年间在中国各地摄影探险，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拍摄过东北、长沙、泰安、重庆等多地的图片，后人将其作品辑成《亚东印画册》。

1927年，岛崎役治来到福建。他对福州这座城市似乎情有独钟，记录得很详细。出入福州的要冲在江岸码头，市场也很繁荣。福建山地众

多，米麦杂粮产量不高，每年要从国外进口，然而福建茶闻名遐迩。虽然近些年印度茶、台湾茶兴起，对福建茶有所打击，但如果政局稳定下来，福建茶还是大有希望的。另外，福州杉木尤其好，是世界极品，龙眼、蜜柑、荔枝、橄榄等物产，品质也很好……

常盘大定（1870-1945）、号榴印，宫城县人，近代日本佛教学者。15岁入仙台道广寺。189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析学科，并进该校大学专攻佛教学。其主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方面，1920年至1929年曾5次来华实地考察佛教遗迹，搜集大量佛、道、儒资料，著作有《中国佛教史迹》《中国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和儒教、道教》，并与犬野贞合写《中国文化史迹》等。1929、1936年间，常盘大定及其助手龙池清先后到达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进行南中国佛教史迹调查，足迹包括已毁于20世纪50年代军火库爆炸的著名的福州东禅寺。



福州东禅寺旧照

林徽因重回故里

陈 宇

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陈钟英老师搞一个课题：福建籍女作家诗人林徽因文学作品的首次搜寻、编撰与结集。选题是她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初，她到北京大学进修，正好有个清华大学来客，听说她是福州人，马上说，哎呀，你们福州有位了不起的女性林徽因，还介绍了一番。从此，陈钟英就记住了这位美貌又才华横溢的同乡。她曾到北大图书馆请教副馆长梁思庄（梁启超之女），才知道还没有林徽因的文学作品集，于是下决心一定要争取机会让林徽因早日“出土”。但是，当我们在福州开始了解她的生平与作品时，才发现，林徽因竟是家乡的“陌生人”。

陈钟英有多个社会职务，曾任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妇联副主任，又是个老福州，有相当广的人脉关系。经她多方打听，福州了解林徽因的仅有两个人。一位是社会贤达、政协委员柯凌汉老先生，他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老友，一起参加过民间社团“庚戌俱乐部”，对林长民比较了解，但仅知道当年林徽因回福州时曾到两个学校做过关于建筑的演讲，除此说不出什么。另一位是林徽因的堂妹林新声（父林天民）。

我们在林家祖厝里找到她，一见面，从风度气质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位昔日的大家闺秀。落座后就上茶，林新声在香气缭绕中说起了往事。1928年，林徽因回福州时，她俩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不时彻夜长谈。她记得林徽因衣着华美，给她讲了许多欧美风光与见闻。林新声终身未嫁，独守祖厝产业。她热情地为我们找出了当年林徽因回福州时画的水彩写生画，还出示了当年林长民赴欧洲前要带女儿一起出游扩大视野的信件（后复印一份送梁从诫）。但林新声毕竟是家庭妇女，不可能介绍林徽因在文学和建筑方面更多的情况。不过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她的弟弟



陈钟英、陈宇访问林新声（中）

林宣在西安，也是搞建筑的，而且跟林徽因格外亲密，也了解得多。

我们前往西安，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找到了林宣教授。他身材适中，温文尔雅，讲起话来轻声细语。我们从家乡远道而来，他十分客气，介绍林徽因情况，坦诚直率。他说自己跟林徽因都生活在封建大家庭里，由于大小房、嫡庶出、两人秉性又不喜乖巧逢迎等诸多原因，在大家庭里都没地位，同病相怜，有许多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他在北京读书时就住在林徽因那里。他说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改徽因，还是他当参谋的。说林徽因喜欢热闹，住香山养病时很寂寞，徐志摩常去看她，二哥（指梁思成）都是叫他陪到山上去。他谈到了林徽因的个性，说，她喜欢什么，也要想尽法子让你也喜欢。当初，梁思成想继承梁启超学西方政治，被她讥笑了一通，说，只有去学建筑，才答应跟他谈婚论嫁。林宣说，自己也是被林徽因“哄去”学建筑的。林徽因殷切希望自己儿子也一样，于是就用宋朝著名建筑



林宣捧读 1990 年港版林徽因文集

匠师李诫之名，给儿子起名“从诫”（遗憾的是终未如愿）。

我们问起了解林徽因的人和林徽因喜欢的人，他说可以去找清华大学的莫宗江教授。早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前，就有个研究古建筑的民间机构叫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在那里供职。该社曾招收学员，莫宗江是孤儿，16岁就投到学社门下谋生学艺，学习方式是传统的师徒相授，梁思成对他手把手授业，日夕相随，亲如家人。谈到林徽因喜欢的人，林宣表示，非常沙娜莫属。林徽因曾对他说，甚至要用自己的孩子去换常沙娜，这令我们有点惊讶。林徽因对建筑的热爱，对瞩目者的喜欢，都达到了极致的地步。

我们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在教师宿舍找到了莫宗江，他手握网球拍刚从球场回来。他精干结实，声音响亮，兴奋时会用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强调语意。他习惯称林徽因为林先生。他介绍了林徽因抗战时逃难到四川李庄，贫病交加，几濒于死，甚至要准备后事等，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与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乃至临终时的情况，十分详尽、动情。林徽因还参加过许多工艺美术设计，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她设计上的艺术情趣与喜好，莫宗江建议我们一定要去找常沙娜。

此前，我们曾听说过关于常沙娜的一些经历。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是第一任敦煌研究所所长。他在满目荒凉的戈壁滩上，一边清流沙，

一边发掘，一边临摹莫高窟壁画。年少的常沙娜就跟着父亲在洞中一幅接一幅地临摹。1948年，她18岁，到美国读书学美术，随身还带着100幅在敦煌临摹的画，父亲交代以后回来要如数完整带回。当新中国宣告成立时，她差一年就毕业了，但热血沸腾急着回国。她偷偷去打工，攒了300美金，买了“威尔逊轮”三等舱票，带着那100幅临摹的画，回到新生的祖国。1951年，担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的梁思成，与特别喜爱她的林徽因，把她调到清华大学当助教，而且就住在梁家近旁。

我们去访问常沙娜时，她已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我们在办公室见到她，自我介绍来自林徽因的家乡，打算编纂林徽因文学作品集并写传略，她露出十分专注与缅怀的神情。

常沙娜从美国回来，本想继承父亲的绘画专业，而且徐悲鸿也同意她到中央美术学院跟他学画深造。但林徽因不断对她进行“诱导”，常沙娜在一篇文章里曾说：“正是由于他们两位的影响，



常沙娜

决定了我走向从事工艺美术教育的人生历程。”

当时，林徽因正关注着北京传统工艺的复兴，抱病带领常沙娜和一些学生对濒于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工厂做调查研究，为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苏联文化代表团”来访设计了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头巾和景泰蓝等礼品。因为有了常莎娜，林徽因心中的构思与设计理念，实现起来得心应手。那时，林徽因身体很虚弱，只上午精神稍好，半卧在床上，根本无法动手画图，就口授常沙娜，对那些礼品造型、图案选用、着色设想，以及民族风格的体现等，一一交代。常沙娜一听，马上心领神会，唰唰唰地就画了出来，两人配合默契，常莎娜简直成了林徽因的两只手。后来，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常沙娜被调到中央美院去，临别时，林徽因依依不舍，可怜兮兮地说：“沙娜，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林徽因的生活情趣。

林徽因是诗人，富有浪漫情怀，对自己的仪表与外貌一向自得、自负、自信。在西安时林宣曾告诉我们，林徽因在香山养病时，常在晚上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穿一袭白色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酝酿佳作。林宣说，“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与形象得意至极，甚至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

但后来，随着肺病日渐严重，加上多个脏器动了手术，体能耗尽，病体不支，瘦骨伶仃。林

宣说，有时外出她就套穿几双长筒袜，一重又一重，把腿撑丰满一点。

常沙娜看到我们带去的林徽因照片，说林徽因床头常摆一张照片，很得意。后来她不愿意再照相了，也不摆别的照片了。她曾伤感地对常沙娜说：“我年轻时多漂亮！现在像骷髅，太丑了！”竟然以“骷髅”与“太丑”这样的字眼自况，要不是听常沙娜说的，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55年，林徽因病重，住进了同仁医院。4月1日凌晨去世，时年51岁。林徽因去世那年，作为诗人与作家的她，还没有一本文学作品集问世，令人遗憾。

早在1937年初，《诗刊》就两次登出“新诗社丛书出版预告”，预告要出版林徽因诗集，但不久后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出版事告吹。此后北平沦陷，林徽因一家逃离古城，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到大西南，落脚在云南边陲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当时林徽因贫病交加，肺病加剧，几濒于死，上海文化界甚至传言她已去世了。抗战胜利后，她捡了一条命，回到北平，没什么文学创作。1949年以后，她过去所写的作品，不合时代要求，无人关注，加之她的文学作品从未结集出版过，所以在她的家乡福州，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女作家。

为了收集她的文学作品，了解她的生平创作，我们从福州出发，到上海、北京、西安、昆明、成都、重庆等地，访问她的亲朋好友同事学

生40多人；查访有关图书馆，包括现已不太为人所知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专用报库。当时，那里最带科技含量的工具是复印机，但有的旧报刊太旧，忌强光与热量，只许手抄。

在上海，我们访问了林徽因的堂妹林新枝、表姐王稚姚，还有文坛宿将施蛰存先生。施老正住在医院里，床头挂着小本子，来访者都在上面登记——找他的人太多了。他向我们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刊物。他还知道上海滩上那个常令人混淆的叫林微音的男作家的底细，我们受益匪浅。

在北京我们访问的人就更多了。文艺界人士就有冰心、卞之琳、萧乾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萧乾先生，我们趁他要赴美国访问前的间隙向他请教，他非常热情。他跟林徽因来往密切。1933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蚕》在《大公报》发表时，就受到林徽因的关注与鼓励，我们在报上曾看到他呼吁要为被湮没的林徽因等人出集的



萧乾

文章。一听我们的计划，他就高兴地说，此举意义重大，功德无量，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林徽因的写作习惯，一般不主动投稿。当时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常登门向她约稿。后来我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中找到林徽因作品的数量，是《新月诗选》里的5倍。不久，我们将四处收集的林徽因作品抄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先送给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征求意见。他说也有人在收集母亲的作品，但还没见收集这么多的，于是拿定主意，支持我们的工作，并表示也写一篇文章附上，以示纪念。过了几个月，我们又找到出访回来的萧乾先生，他看见我们装订工整的手抄本，非常兴奋，翻看摩挲，爱不释手。谈到出版的事，他马上写了一张便条，介绍我们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小沁女士，上面写着“希望能在我社出版”（萧乾曾在该社任职）。我们找到刘小沁，一谈，发现碰上了知音——她也是林徽因的崇拜者，不仅跟梁从诫甚有交往，还是同行（梁从诫任《大百科全书》编辑），于是谈得相当融洽。作为文集的编纂者，我们自然力求客观，不避讳历史争议与歧见。但梁从诫是至亲，



刘小沁（右）与梁从诫夫妇

难免有感情因素牵扯，有时在史料取舍与措辞上我们之间有歧见，因有刘小沁居中沟通与协商，于是选本顺利完成。

但请谁为这位湮没已久的作家集子写序？颇费思量。刘小沁邀请了几位在京的作家撰稿，最后选定了萧乾写的文章。萧先生是名记者，文中既有对林徽因人生经历的总体介绍，又有许多自身亲历，还有生动的细节描写，可读性强。1933年，萧乾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蚕》，被林徽因看到，颇为赏识，就通过沈从文约去见面。沈从文引见之前告诉他：“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邀请你去她家吃茶。”一见面，林徽因当即对小说予以评点与热情鼓励，当时萧乾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在事后说：“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上一鞭。”此后，他在林徽因的关心指点下，逐渐成为知名作家。当刘小沁把书编好了，序也选好了，岂料由于习惯上人们把林徽因划归为“新月诗派”，“小资”色彩浓厚，其作品跟高亢的革命激情与英雄主义的要求甚有距离。出书事暂搁。在等待中，刘小沁瞧准时机，化整为零，抽出诗歌，先出诗集，先做小件，再伺机组装文集。终于先行做成《林徽因诗集》，于1985年出版。这距离1937年《诗刊》预告林徽因诗集出版已过48年。林徽因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终于面世。

诗集编纂中，刘小沁约请沈从文写一篇纪念性文章，他愉快地答应了。这应该是最佳的不二人选。

林徽因跟沈从文的交往，颇有戏剧色彩与雅趣。

林宣告诉我，一次，林徽因向沈从文要一本他的新作。沈从文左右为难，因为身边只有一本了，是准备送给冰心的，而且扉页已写上：送给诗人冰心。但林徽因是急性子，催得紧，只好把那本送去。林徽因打开看到扉页，表情骤变——像开了一朵花。原来上面所写是：“与其送给诗人冰心，不如送给诗一样的林徽因。”

沈从文经济比较困难，林徽因有意接济他，两次找借口向他借书，看完由林宣送还，但里面夹着两张大票——这是当时文化人小圈里馈赠的一种方式，双方心照不宣，避免受惠者不好意思。

1936年，萧乾调到上海，同时继续编辑沪津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他希望借《大公报》创刊10周年机会，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请谁来编呢？萧乾说，“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30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如蹇先艾、沙丁、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同时还选了一些新人，如沈从文、萧乾。林徽因审读这些作品后写了题记，对作品题材的开拓与扩展，给予热情鼓励与宣扬，说：“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在该书推介广告中，她把沈从文置于30人之首，由此可见她对

沈从文的赞赏。

林徽因跟沈从文交谊颇深，现在要出版林徽因诗集，当然请他写些感念文字附上是最好的。刘小沁去约稿，沈从文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沈从文病倒，卧床不起，半身不遂，后来去世了。幸好刘小沁抢先了一步——先期请沈从文题写了诗集书名，出版时终于用上了。

自《林徽因诗集》出版后，刘小沁还编撰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卷》（分别于1990与1992年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纪念回忆文集《窗子内外忆徽因》（2001年出版）。此后林徽因热日渐攀升。

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一珂策划并任责编、陈学勇著《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面世，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是“最为严肃完整的林徽因传记”，它还读者“一个真实鲜活的林徽因”。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一珂对该社以前出版的梁从诚所编《林徽因文集》进行大幅度修



沈从文为《林徽因诗集》题写的书名



大开本精装版《林徽因集》封面 古厝里走出的林徽因



北京珐琅厂代表（前排左）专程送大会的景泰蓝精品（前排右陈秀梅手捧），同时接受回赠的福州特种工艺品林徽因像

订增补，得到梁从诫遗孀方晶等人鼎力相助，大大扩充了内容，改成大开本精装版，更名为《林徽因集》，分为“诗歌·散文卷”“小说·戏剧·翻译·书信卷”和“建筑美术卷”（上下册），故称三卷四大册。这是当时林徽因著述与资料最完整最翔实的本子。

2021年7月16日至31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之际，“林徽因——福州古厝走出的文化遗产守护者”展览在福州召开。林徽因的外孙和外孙女克服了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赶到外祖母家乡，参加了推迟一年的盛会。但常沙娜年已过90，因乳腺癌动过手术，体力受影响，加之来去隔离观察时间又有新规定，无法前来。不过她亲自动笔为展览写了前言，还发来祝贺视频，使这次活动顿然增色，令人感动。

世遗大会开幕时我在外地，闭幕前三天赶回福州，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乘车去三坊七巷中轴线的南后街，终于找到了82号。我跨过厚实的门

槛，来到了林徽因的大展厅，四近还有几间小展室。展厅里悬挂着从20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300多张照片，基本可以反映出林徽因一生的经历和她在文学与建筑学两方面的成就。一间展室书架上还摆放着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壁上镜框里展示着书信手稿等。展厅里还摆放着北京珐琅厂为祝贺这次大会专程送来的一件景泰蓝精品，以及福州非遗传承人为纪念林徽因创作的漆画、寿山石雕等工艺品。

令我最难忘的是，当我刚刚起步走向古厝最里面的一进时，老远老远地就见到林徽因如一阵清风似的迎面款款而来。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幅硕大无比的林徽因肖像照，其高度快触碰到屋顶了！那是林徽因少女时代在英国伦敦拍的。形象为坐姿，神态端庄、高雅、俏丽。胸前垂着一根长长的扎有蝴蝶结的辫子，双手轻抚膝上，脚下是长长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入场参观者的脚前……

“我要向这片土地致意”

——克洛岱尔的福州叙事

苏少伟

“我要向这片土地致意，并非随口虚构的话语作一种肤浅喷发，而是让大量的心里话突然涌现，围绕群山之麓，就像被一条三岔之江穿越而过的一大片麦穗滚浪的海洋。”1898年10月16日，克洛岱尔写下《致意》这篇散文作品。他笔下的“这片土地”，便是福州。在其他文章中，克洛岱尔也把福州称为“彩色的天堂”。很明显，这段话里有一种对福州炽热的情感。克洛岱尔说，他的致意不是“随口虚构的话语”（那就是诚挚），亦非“肤浅喷发”（那就是深情），他认为福州的土地是“德高望重的躯体”。数语之间，作者对福州的热爱便跃然纸上。

保罗·克洛岱尔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是诗人、剧作家，著有《五大颂歌》《三重唱歌词》等诗歌作品，《城市》《给圣母报信》《少女维奥兰》《金头》《交换》《正午的分界》《给玛丽报信》《人质》《硬面包》《受辱的神父》《缎子鞋》

等戏剧作品。

作为驻中国的外交官，克洛岱尔在上海、福州、汉口、北京等几个地方都短暂停留过、生活过，但只要在福州，他便全方位地考察了福州的方方面面，也因此“结晶”出多篇有关福州的诗文。他的《高处之海》《良心寺》《十月》《绘画》《静观者》等散文诗篇，创作于福州，写出了福州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俗、地理环境、文化风气，等等。后来集结为《认识东方》的散文诗集，共61篇文章，其中有33篇是写他在福州的见闻、感想、思考。可见，“福州叙事”一直都是克洛岱尔的描述客体与抒情对象。

克洛岱尔带着深厚的感情，描绘福州。榕树作为福州城的象征之物，是不能不被注意到的。克洛岱尔有一篇题为《榕树》的作品。一开篇，他就盛赞榕树为“生长在此的巨人”，并形象地写出了它的遒劲、有力：

“那是一些新生枝条直挺挺的抽张，种种迂曲与圆拱，腰肢和肩膀的扭曲，腿弯的放松，千斤顶和撬杠的游戏，是一条条胳膊在举起，在放下，似乎以它们伸缩自如的关节抬举起了身躯。这是巨蟒的盘结，这是一条七头蛇，正奋力挣扎，要从坚硬的土地中脱身。”

一种语言上的力量显露出来。榕树的树姿、树根、树枝等，在克洛岱尔笔下，都带有极强的画面感。其实，这一篇文章里，不单是写榕树的英姿，克洛岱尔更借物咏怀，认为榕树具有英雄气质：“而我则在榕树身上看到了一个植物界的赫丘利，它威风凛凛，稳稳站立在它那艰辛劳作的纪念碑之中。难道不是它，这被缚的庞然大物，战胜了土地的固执而又吝啬的抵抗吗……”以此赋予榕树一种顽强、有力的品格，抽象出榕树的拟人之态。

事实上，在福州的那段时间里，克洛岱尔对福州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只要有时间，便走向福州郊区，看遍风景。1896年6月24—27日，他出城郊游，并记叙了这次郊游的所见。第一篇文章是《走向山野》。看得出，他起得很早，“一抹微红的磷光预示了黎明即将来临”。他沿途走出城区，一路见到厨子厨娘、店老板等人起早后的劳作。他还白描式地写出醒来的人的情态，似乎有点丑态。但最终他感受到睡梦初醒后的“万物一体”：“万籁俱寂，因为这一刻，大地正涌动源泉，准备让人畅饮，她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会拥向她自由的乳房；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也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是义人，还是罪人，是审判官，还是囚徒，甚至连同牲畜活物，所有人全都在一起，如同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尽情地畅饮大地的琼浆！”这里有一种浑厚、朦胧的语意，也体现了人类平等的原始意识。作为法国天主教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克洛岱尔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感。这种强烈的写作风格，也流露在这段话中，体现出宗教意识和神秘意识。但是，总体来讲，福州城的早晨，令克洛岱尔感到心情的平和。而后，文章以田家农女劳作时的笑声结尾，并说“沿着种植了水稻、烟草、豆角、南瓜、黄瓜和甘蔗的一畹畹农田，一路走向山野”，寥寥数语便充满田园风趣。在《高处之海》中，克洛岱尔继续叙写这次郊游。他终于登上了福州的高山，远望大海。这时候，他的思绪更加热烈，情感更加汹涌，想象更加欢跃，他说：“我将吹响笛子：我将敲响皮鼓，而船娘，像一只仙鹤那样单腿独立，并用另一个膝盖顶住紧抱住她乳房的婴儿，摇动舢板，前行在平平的水面上……”郊游的这一天将要结束，太阳快落山，他走在台阶上，看到台阶上裂开的松果，“恰似一朵朵玫瑰”（《良心寺》）。

我们通过这几篇文章可看出克洛岱尔对福州人与土地的情感，他既感受到神秘的东方色彩，又对这种生活充满欣赏。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旅行家、文人等大部分都带着一种偏见来审视东方土地，呈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是，克洛岱尔呈现大体上还是实事求是的，



这在他的那个历史时期，是难得的。

其实，这样的出游，在克洛岱尔多年的福州生活里很常见，他一有空就喜欢到处游览福州城，从市井生活、自然风光中写出自己对福州城的感怀。正如1896年3月15日，下午2点30分左右，克洛岱尔乘坐轮船第一次到达福州，那个月里，他就写了一篇《坟墓——喧嚣》的文章，表达了初到福州的新鲜感，他对福州的城市、建筑、城墙、船筏、道路等一一仔细的审视：“城市就在山下，在宽阔的闽江的对岸，黄色的水流奔腾汹涌，急急地流过万年桥的桥墩。白天，人们看得见，山上残缺破败的古城墙围绕着城市蜿蜒伸展，恰如我说过的坟墓的石头井栏（飞翔在天的鸽子，还有一座塔寺中央的宝塔，都让人感觉这一空间的辽阔无极），飞翘的屋顶，树木葱茏的两座山岭，矗立在一栋栋房屋之间，而在河流之上，百舸争流，一派杂乱，有竹木的筏子，又有平底帆船，后者的船尾装饰得如同画舫，花里

胡哨的。”他的观察很细致，而且又生动，画面感、细节感都很不错，勾勒出清末福州的城市街景。他对福州话也很关注：“差不多有一百万人生活在那里：我倾听着在空气之湖底下这一众多嗓音汇成的说话声。这是一种喧闹，既滔滔如浪，又淙淙如溪，带有一缕缕突如其来的暴烈，就像被人撕裂的一张纸。我甚至认为，有时候我还能辨认出一种音符以及音调的抑扬变化，就像人们恰到好处地把手指头放在鼓面的正确部位，为一面鼓调音那样。”这是市井的声音，更是福州的活泼泼的社会生活画面。克洛岱尔对语言、语音很敏感，特别注意福州话的音色、音调。

大概也就在这段时间（1896年三四月），克洛岱尔记下了他游览广东会馆的一段经历，写了《戏台》的文章。他不厌其烦地叙写会馆的大殿、内堂、座椅、平台、盖顶、牌楼、支柱、幕布。最绘声绘色的是戏剧演员的妆容、服饰、动作、表演，并对戏剧节目的节奏、情节、音乐等做出评论。克洛岱尔盛赞演员和戏剧的高度融合：“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一段唱腔或一段舞蹈中时，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物的唱念做打，连同他的戏服行头，会脱离出这一总体的舞蹈节奏与曲调旋律，而正是这节奏与旋律衡量出了距离分寸，并规定了情节的进展。”他对戏剧的奏乐及乐器，认真地谛听了。他从中听出了三弦、月琴、板鼓、檀板、唢呐、锣、镲、铙、钹的音色及其用途。特别是唢呐，克洛岱尔写得可谓声色俱佳：“这是某种喇叭，带有黄铜的筒口，它发出的带有和声

的音调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暴烈，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锐利。它如同一记驴叫，荒漠中的一声猛吼，朝向太阳的一阵铜管乐，大象软骨发出的一种打嗝一般的喧闹！”在福州的7年间，克洛岱尔走遍福州城的各个地方，跑马场观看赛马，游览乌塔和白塔、孔庙，乘船游览闽江……

克洛岱尔并不是对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他对福州的热爱是独有的，因为在其他城市（如上海），他感觉不到快乐。倒不是说上海这座城市让他不适应，而是上海官场上的做派令他倍感压抑。相比较而言，福州以其素朴的生活、宜人的环境，让克洛岱尔的心情愉悦。本文开头的那篇写于1898年10月16日的《致意》，正值克洛岱尔从上海回到福州，心情大好。同样的海上航行的，还有一篇名为《海上遇险》的文章，写于1899年1月。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分明感受到落地福州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克洛岱尔在文章中，明显地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海上的航行是凶险的、恐怖的：“在我四周，没有任何坚固之物，我置身于混沌之中，我迷失于死亡的内部。我的心被最后一刻的忧伤紧紧揪住。我根本就不是面临着一种威胁的袭击；我仅仅只是处在了根本无法居留的境地；我早已方寸大乱，我漠然地漫游。”这是“忧伤的景象”。但是，当结束这烦闷、凶险的海上航行，到达马尾港时，他感觉“生命复又展现”，他激情澎湃：“白日将尽之前，我看到我的船进了这个港，港湾隐匿在群山的怀抱中，恰如一个偏僻的水库。一下子，生命

复又展现！我怀着一种山野之人的快乐，继续欣赏一度中断了的景象，这块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垦拓之地，多么纯洁而又奇特的公共地产，这一持续不断、花样繁多、名目混杂的开发，带来了万物共处的一派繁荣。”

这种轻松心情也反映到了他的休闲类作品里，他写于福州的《茶之醉》，就显示了闲适的生活。“而这碗盏中，有三朵荷花沉在底上，大饱眼福啊，彩釉上鲜艳夺目的图案，一种如此清爽如此强烈的蓝色，恰好比最显眼的红色莫过于碧血，我把茶杯递到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滚烫的香气……”在克洛岱尔的这篇文章里，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文学品味，也寄寓着他放松与闲适的心情。

总的来讲，克洛岱尔是热爱福州生活的，他在《香港》里说：“就让我再度证实一下福州，一种回顾和怀旧来重访。”而这一切的热爱，集中在《认识东方》这部散文诗集里。还有那些代表着文化、思想的戏剧、诗歌，例如《受辱的神父》《缎子鞋》等，但是，如果没有在福州（以及上海、汉口等）深入地体会中国风情、文化的相关经历，克洛岱尔想要完成这些名作，多少是不现实的。他能写出的那些戏剧名作，恐怕多少也得益于他在福州广东会馆看戏的经历。一句话，福州是克洛岱尔“中国叙事”的重要一站，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场所。从这里，克洛岱尔直抒对福州城的热爱、享受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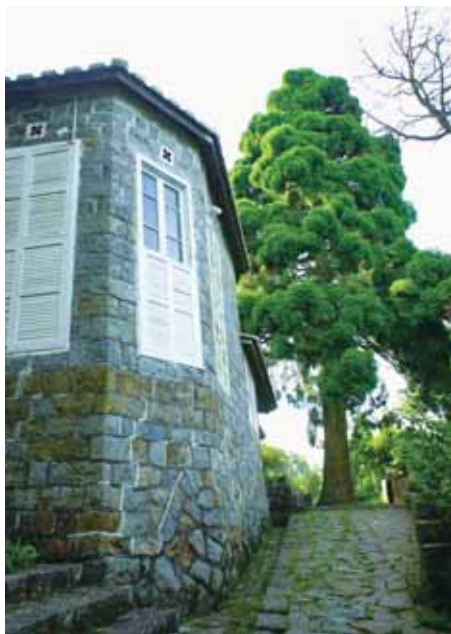
宜夏别墅——1984

黄文山

当看到这幢熟悉的老房子和老房子前两棵高大的柳杉树，看到房前钉立的标识牌，我不禁在心里叫了一声：哦，宜夏别墅！

38年前的夏天，我曾在这幢老房子里住过12天，当时只知道这里是鼓岭公社招待所，并不知道它的原名叫宜夏别墅。这情景好像是邂逅一位曾经的故人，却刚刚才得知他的真实姓名，得知他的过去，有一种喜剧的效果。万千感慨一时涌上心头。

从鼓岭老照片以及介绍中得知这座别墅是鼓岭的西洋老建筑之一，当时叫鼓岭疗养院，顾名思义，是旅居福州的各国洋人在鼓岭度假时的疗养机构。由于来鼓岭居住度假的外国人日益增多，鼓岭开始有了别墅、教堂、邮局、商店、照相馆、俱乐部、游泳池，医疗机构自然不可或缺。1919年，威廉·甘布尔夫人向美以美会捐资4000美元，由美德信医生设计建造了鼓岭疗养院。因为位于宜夏村，所以又叫做宜夏别墅。这幢别墅



占地 390 平方米，建有三个病区，以及一间手术室、一间浴室。疗养院的规模虽然小，却是当时鼓岭唯一的一所医院，很多外国孩子在这里出生，鼓岭当地的居民也能到这里看病。别墅还设有一处开敞宽阔的外廊，便于疗养者休闲、交流。100 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洋人们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有，有的站在外廊上，有的坐在台阶前，或叉手静立，或敛容凝思。宜夏别墅留下了他们在鼓岭度假的快乐身影，他们的记忆里也因此刻下了一段难忘的福州时光。

我的心中掠过一道闪电，照亮了一段历程。我们也有一张相似的照片，大家参差排列在台阶两旁，或沉思或微笑。旁边，两棵柳杉静静地伫立，相视无语。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人群。因为这座有着宽敞的外廊和众多百叶窗的西洋建筑，曾经也是我们 30 多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文学作者的聚会之所。

那是 1984 年 7 月，《福建文学》编辑部刚刚经历过一次大面积的人事调整。一大批老编辑潮水般地退出编辑部，把他们的位置让给新人。全盛时拥有十多名编辑的小说组只剩下我一位“老人”，还有两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陈健和廖一鸣。

当时我到《福建文学》已经 8 年，年头虽说不短，但编辑部里老编辑多，我始终是配角，做的都是助手的活，从未独当一面过。《福建文学》编辑部当年在杨桥路的一座红砖大楼里办公。小说散文组的房间最大，大约有 100 平方米，十几

张办公桌依次分列在墙边，中间摆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工间休息时，大家可以打乒乓球。可是现在，环顾四周，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冷冷清清，如同潮水倏然退去的海滩。为了应对编辑人员锐减导致稿件不足的严重局面，我连续组织了两次小说改稿班。第一次在连江筱程，第二次便安排在鼓岭。参加改稿班的都是近年来在创作上较为突出的小说作者。

当时普遍没有空调，夏天办班需要找个清凉的去处。于是有人向我推荐了宜夏别墅，当时叫鼓岭招待所。到了一看，果然十分理想。宜夏别墅为石木结构建筑，墙基高 1.5 米，面阔 25 米，进深 36 米，有 10 个大小不等的房间，可供 40 人住宿。特别是它拥有良好的通风系统。通风口就在墙基下，并贯通于各个房间，即便是中午最炎热的时候，房间里仍微风习习，十分舒适。

那次改稿班的时间不长，但要操心的事不少。首先是要自办伙食，煤炭、副食品都需要事先打报告申请。我们还特地聘请了一位退休厨师，又在本地找来一位郭姓小伙子帮厨兼采买。因为有他，我们得以尝遍鼓岭本地所有的可口菜蔬。印象最深的是“鼓岭四宝”：佛手瓜、白萝卜、地瓜和嗨菜。后来这位小伙子竟跟随我们到了西郊的省文联机关，担任新办的食堂炊事员，一直到退休。

参加改稿班的作者有肖东、施晓宇、黄锦萍、汪宝珍、王世彦、郑枫、林孟新等，还请了几位闽南作者。其时鼓岭已有公路，但尚不通班



车，公交车只开到涌泉寺。从涌泉寺到鼓岭乡还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我们包了一部大巴车，从凤凰池省文联大院出发，穿过市区一路向东，直到鼓山脚下的廊院，而后盘旋上山。透过车窗，甚至看得见高耸的劣崩峰。

后来以中篇小说《双镯》扬名的惠安作者陆昭环因为错过了上午的集合时间，傍晚一个人上山。那天我去接他，出了宜夏村，沿着盘山公路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到达一处山口，极目眺望。终于等来了瘦高个的陆昭环，他应该也看到了我，老远就脱下身上的外套，在头顶上不住地挥动着。

一位女作者似乎有满腹心事，一天晚饭后，她独自一人到野外散步，直到8点多还不见回来。其时的鼓岭还相当荒凉，远近十几公里没有人家。我急坏了，赶紧叫上几个人，顺着山道找了好几公里，才看到悬崖边一个茕茕独立的黑影。

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张传兴，身体很胖，患

有心脏病，不爱动，傍晚大家都去散步，他却常常一个人搬来一张藤椅，静静地坐在别墅的长廊上，对着黄昏的景色想心事。他有一个恩爱的妻子，有一次变天，气温骤降，他的妻子竟独自从山路走上来为他送衣服，让大家好一阵感动。

那年，我四岁半的儿子因幼儿园放假也随我上山来了。宜夏别墅成了他的乐园。儿子淘气，在屋子里待不住，一逮住机会就往外跑。恰好，有位作者的儿子也跟来了。男孩叫俞海，14岁，大家都随我儿子叫他“海哥哥”。“海哥哥”整天领着我儿子，白天在树林里、草丛中转悠，晚上则跟着班里的大哥哥们打着手电筒去山涧抓溪蛙。我不知道，一个充满野性的鼓岭，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38年的日历匆匆翻过，而今，我再次行走在这条鼓岭老街上，一切都熟悉，一切又都陌生。根据指示牌，我很快就找到了这座宜夏别墅。经过整修的别墅，成为一处休闲咖啡馆。这里已无人居住，可是昔日的场景却一一浮现在眼前。当年参加改稿班的张传兴、陆昭环、廖一鸣3人已先后辞世，我却仍能记得他们在宜夏别墅时的音容笑貌。有意思的是，这次在鼓岭傍晚散步时，又遇上帮厨的那位郭姓小伙子，不，现在的他已是一位身背微驼的老人了。岁月无情的刻刀，竟不曾落下哪一位过往人。

柳杉、塔楼、外廊、百叶窗、通风口……哦，宜夏别墅，你不也是我人生的一张未曾褪色的胶片？

鼓岭风云

林思翔

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鼓岭，不仅气候宜人，还是一处绿满山崖、风光秀美的好地方。难怪20世纪20年代中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庐隐，在这里小住一段后依依不舍地说：“我往往想，这种清幽的绝境，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

生态自然、空气清新的鼓岭，是福州的东部屏障，是福州通往东部江海的战略要地。数百年来，鼓岭屡遭侵略者和邪恶势力的蹂躏与践踏。这里的人民富有血性，不甘凌辱，为保卫福州、护卫这片“绿宝盆”，前仆后继，英勇无畏，谱写了一页页抵御外侮和抗击邪恶势力的壮丽篇章，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硝烟弥漫牛头寨

在鼓岭过仑村大坪顶，如今还保留着一座石

墙高筑的古寨，寨墙延绵至悬崖边。因紧靠牛头崖旁，故名牛头寨（又名鼓岭寨）。斑驳的墙体和残存的石磴路，为我们讲述了400多年前戚继光将军在此率部抵御倭寇的往事。

明嘉靖三十年（1551）后，在浙江被戚家军重创的倭寇突然转向福建骚扰。他们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的罪行惊动了朝廷。嘉靖皇帝飞诏浙江总督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领兵入闽抗倭。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家军漂亮地打了几次围歼战后，倭寇更加残暴狡猾，多次采用长途奔袭、声东击西战法，侵犯福州、福清、莆田等地，残害平民百姓。

戚继光入闽后及时召集军人谋士共同商议破倭之法。随他入闽征战的汤将军祖籍福州，他建议戚将军分兵设伏，在倭寇必经的鼓岭险要之处修筑关隘驻兵防倭。

鼓岭与鼓山相连，峰耸岭峻，古木森森，



牛头寨古城墙



古道

是福州通往闽东的必经之路。当风尘仆仆的戚家军赶到鼓岭时，天色已经昏暗。当地长老举着火把，连夜陪同汤将军考察山形地势。汤将军到鼓岭过仑山通往连江的古驿道察看后，认为大坪顶地势险要，宜于设立关寨拒敌。于是，他连夜造影画图，飞报统帅戚继光。戚继光接报之后，驰令汤将军在两个月内修好关寨以御倭寇。同时，提出要分兵排布鸳鸯阵，以缓解倭寇翻越鼓岭进攻福州给北门带来的压力。

于是，戚家军分出兵力三五成组布成鸳鸯阵，在数十里古驿道险要之处，布置了弓箭、火铳等暗器，准备随时与来犯之敌周旋。同时，又集中兵力在鼓岭过仑山的山顶修筑军事要塞。当地山民见戚家军一心为民守护福州，也纷纷四处动员，邀请鼓山下的乡亲一道上山修寨。他们还

积极献出石头、木料、砖瓦等修寨材料。不到两个月时间，一座雄伟壮观、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在过仑山山坪上出现了。山寨居高临下，扼住驿道咽喉，雄伟的寨墙直逼东边的牛头悬崖之上。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初，在福州南部高盖山绿野寺一带被戚家军痛歼后逃出闽江口的倭寇不甘惨败，又集结人马，在当年隆冬，从闽东古驿道奔袭福州北门。由数百倭寇组成的偷袭队伍穿山过涧，衔尾而进。早已埋伏于数十里驿道两旁的戚家军小股部队不断用弓箭和火铳等兵器杀伤倭寇。但倭寇还是冲出了鸳鸯阵，一直进逼到了鼓岭过仑山下。那一路受惊、损失不少的倭寇想趁风天雪夜翻越鼓岭直袭福州时，戚家军早已得到探报，陈兵牛头寨，枕戈以待。

只见大坪顶之上，一座雄关巍然屹立在古驿

道中。寨门紧闭，高耸的门楼上灯火辉煌，旌旗飞扬。而那倚崖修筑的土石寨墙绵延数里坚如磐石，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关隘。望着戚家军人声沸腾的牛头寨，倭寇军心大乱，无心恋战，只得灰溜溜地从古驿道撤退逃到闽安镇。一路上再遭戚家军袭击，又损失了不少人马。从此，鼓岭牛头寨抗倭美名传扬福州。

如今战争烽火早已没入历史风烟，人们仍经常来牛头寨参谒，听古寨陈墙讲述鼓岭军民同仇敌忾抗御外侮的往事，缅怀英勇善战的戚家军。

战歌长留别墅间

在鼓岭宜夏村的一座石墙别墅里，70多年前曾住着一家美国人，主人叫唐迈克（中文名穆霭仁）。

1940年，19岁的穆霭仁还在上大学，机缘巧合中，他获得一个前往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穆霭仁一直对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很感兴趣，于是到日本后，就找机会来了一趟中国。那次中国之行让他对这个神秘东方古国印象更加深刻，带着美好记忆返回美国。

1944年，对中国念念不忘的穆霭仁选择了参军，结果被挑选加入了美国陈纳德将军志愿援华的航空队，即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投入抗日反攻阶段。穆霭仁中尉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贡献。战争结束后，又带妻子来到中国福建，在一所学校任教。每年夏天全家

都上鼓岭避暑，他爱上了鼓岭，也与鼓岭村民结下了友谊，还曾输血救了村民轿夫的生命。

这位“鼓岭居民”抗日英雄的芳名，被镌刻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的福州抗日志士纪念馆墙上。受他的感召和影响，其儿孙辈也一直在为传承中美友谊效力。

在鼓岭梁厝村柳杉王公园边，有座二层杉木结构的别墅，门额上挂“大梦书屋”四个大字。这座书屋曾经是海军名将李世甲的别墅。1936年，李世甲从万兴洋行购得这座古屋，作为自己的度假别墅。

原籍长乐的李世甲，抗战期间可是声名显赫。13岁考取烟台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由于学习勤奋，每试均列前茅。1911年6月毕业后在通济练习舰见习。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通济舰响应起义，李世甲随舰参加光复金陵等战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身为海军少将的李世甲，下令撤除闽江航道标志，征用一批商船、民船和超龄舰艇装载沙石沉于长门港口，在闽江两个港口填抛石堆161堆，阻遏敌舰深入。1939年6月，日军侵占闽江口外的川石岛，与长门要塞对峙，李世甲加紧在重要港口布雷，增设辅助封锁线，严加戒备。

1941年4月19日，日本海陆空军大举进犯福州，日舰猛攻长门。李世甲率驻闽海军在马尾、长门地区与敌战斗，伤亡颇多，长门、马尾相继弃守。4月20日福州沦陷，李世甲转移至鼓岭地区，被困两昼夜。突围后，移驻古田水

口。是年5月，任闽江江防司令，仍兼海军陆战队旅长。9月1日，福州的日军开始撤退，李世甲率队随即收复马尾、长门。1944年9月日军再度进犯福州，李世甲率部抵抗，在长门至岭头之间作战七昼夜，后因大北岭陆军主阵地被攻破，乃奉命撤退，布防于桐口、白沙一带，继续与敌周旋，大小战斗共数十次。

1945年5月，日本准备撤退，李世甲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八十师分三路进迫福州。福州收复后又收复马尾、长门。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李世甲作为接收专员，负责接收厦门和台湾的日伪海军。1949年8月初，李世甲携妻儿前往厦门，准备赴台湾。旋闻海军前辈萨镇冰、陈绍宽等人没去台湾，遂于8月15日返回福州，于1970年4月病逝。

穆霭仁居所、李世甲故居，两座别墅见证了一段中外人士戮力同心抗击侵略者的光辉史实。

暗流涌动大洋坪

在鼓岭宜夏村大洋坪，有一座石墙围起来的二层石屋，屋前的空坪上散落着石鼓、石桌、石凳、石磨、石臼以及零星的石板条，还有一面镌刻英文的石条路牌。屋内摆放着打石、雕刻用的凿、钳、锤、铁盘等工具。看得出来，这是一户打石人家。当地朋友介绍说，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闽浙赣游击队在鼓岭联络站旧址，主人是石匠刘慈幀。



闽浙赣游击队在鼓岭联络站旧址

刘慈幀，原本姓林，1905年生，永泰人。他长期在鼓岭以打石谋生，后入赘刘家，与刘家二女儿刘福弟成亲，改为刘慈幀。1945年的一天，刘慈幀在干完活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身穿灰色长衫、头戴礼帽、手持竹杖的中年男人向他问路。这位说是找洋人谈生意的商人，自称“老李”。这个“老李”就是当时闽浙赣游击队负责人林白。“老李”与刘慈幀攀谈起来，并拿了一块大洋定做一对石料镇纸。

说话间，老李从衣衫内袋掏出一张字条，递给刘慈幀，叫他刻在镇纸上。字条上写着：“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刘慈幀不明含义，老李笑而不答。刘慈幀忙拿着这字条走到院子里，给孩子姑妈刘淑瑜看，姑妈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明白这是宋代诗人王令的诗句，语出其诗《龙池》，意思是久旱盼甘霖，愿为其赴汤蹈火的意思。她隐约觉察到字里行间有为大众谋幸福之

意，但没有说，只是声称山里近日有老虎，让刘慈幀送老李上山。暗中叮嘱刘慈幀，老李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多问。

从此，刘慈幀在铁锤柄上凿了一个空隙，接上锤头，放在平日干活背的棕包里，开始为我党地下工作者传递消息。他主要负责联系东岭上的游击队。

一天夜里，窗外忽闻狗叫，刘慈幀急忙穿衣开窗，窗外什么也没有。他不放心，就起来到狗窝旁细瞧，只见狗窝顶上的稻草丛里，夹杂着一根红色纸卷，他赶忙抽出纸卷回屋。这便是刘慈幀传递的第一份情报。

一晃就到了1947年，两年来，在中共闽江工委的组织领导下，城市干部、党员不停地走进大山，发展了许多游击队员，他们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福州周边各县。这期间，刘慈幀做了许多工作，也经历了许多。为使游击队同志在紧急情况下便于撤离，他不惜“破相坏风水”，在自家厅堂正面墙体上砸开个穿堂小门，直通后山，平时则用立柜挡着。游击队时不时就在其后山石坑开会。

1948年3月中旬，由于叛徒出卖，一批地下党员被捕。一日晚间，刘文耀拖着疲惫的身体敲开刘慈幀家的门，他浑身泥泞，草草吃了饭，胡乱洗了脸就睡了。没多久，村里甲长杨道金便来到刘慈幀家，一脚踢开房门，把还在睡梦中的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这伙人把屋子上下搜了个遍，没发现什么。

原来刘慈幀这一普通农家居所的楼上暗藏

秘密。孩子姑妈刘淑瑜住的小阁楼里，床底下有个暗格，至少可藏进去一个成年人。每次刘文耀独自留宿的时候，只要山里远远有狗的急叫声，家人就会马上把床上的草甸子一掀，木板翻开，让刘文耀躲进去。因为是闺房，一般没有男人出入，不会被发觉。刘淑瑜阁楼里有许多书籍，还有圣经。甲长杨道金来刘家搜查时，还从阁楼里搜到一本英文书。刘慈幀夫妇不知这是一本什么书，也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刘淑瑜告诉他们，那本书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948年4月，阮英平遇害后，闽浙赣省委严查城工部，作为城工部负责人的林白受到牵连。他只能在自己设置的几个地下联络点轮流落脚。一天，林白与刘文耀又来到刘慈幀的石厝。因刘慈幀要带岳母进城看病，就与林白交代了几句，让他们在屋里待着，并从外面把门锁上。此时，在外面鸡舍里放哨的游击队员出来透气，正好被盯梢的杨道金看到。于是杨回去带了人马赶来，欲抓游击队员。林白与刘文耀以最快速度从后门上了后山。当刘慈幀一家从城里回来时，鸡舍已被烧毁，正冒着青烟，家里人去楼空，这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联络站的任务也就从此中止了。

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为革命胜利做出贡献的林白、刘文耀以及刘慈幀等人均已离世。但人们永远忘不了这“红色前哨”，忘不了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如今，经过修复的古厝，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绿树拱卫，四季常青，为人们讲述着革命者激情燃烧的风雨春秋。

流动的欢宴

鹿野

枯叶堆积的林荫古道，一行人穿行其间，每走一步便发出“嚓，嚓，嚓”的声音，那是绵软的落叶被脚步踩碎的声音，令人感觉温暖踏实。松树林间透下来的冬日艳阳照得树枝上的蜘蛛网晶晶亮亮的，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旁观这一切。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要去向哪里，去寻找什么？去探访那不为人知的鼓岭的另一面，一个失落的，又在不久的将来要重新面世的神秘角落。

1

让我们从百年前的一场筵席开始。感谢当时已经有的照相术，得以看见百年前一场中外人士参加的家庭聚会。照片上方用优美的手写体记录了这场宴会的主题“为庆祝葛尔锡50岁生日派对”，时间是1904年，地点写着鼓岭；一块不算宽敞的平地上，摆着五六张方桌，四周的长凳上



葛尔锡50岁生日寿宴

坐着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两个光头小孩儿转头朝向摄影师的方向。远一点可见穿着西洋礼服的主人葛尔锡夫妇站在石头垒成的房子门口，那是一栋最为典型的鼓岭石头厝，灰黑的石块以一种近乎自然天成的方式拼接在一起，形成厚重而

坚固的墙体。房子并不高，人字形屋顶不过比站立的人高出一点，木质的百叶窗敞开着，让闽江口吹来的海风可以轻易穿堂而过。

百年前像这样简陋的房子在鼓岭上数量众多，最多的时候有300多座。这一座的主人葛尔锡是美国驻福州领事。如果我们到过仓前山的爱国路2号，葛尔锡曾经在那一座富丽堂皇的领事馆里办公。1890年9月至1893年1月，1897年到1912年，葛尔锡两任福州领事，应该说是一位对福州比较了解而且与当地百姓相处比较融洽的美国领事。

葛尔锡在福州的十来年间，大部分是待在仓山的领事馆里处理令人头痛的侨务管理与外交事务。比如1897年，驻福州领事馆翻译职务空缺，领事葛尔锡想要聘用英华书院毕业的中国人，此举引发当地美部会教士不满。30多名教士联名推荐在闽北邵武传教的美部会教士和约瑟任翻译，称“翻译职位应尽可能由美国公民担任，才可以保护美国利益”，葛尔锡只好妥协。又比如在华的教会人士常常越过他直接与地方官沟通，导致他这个领事常常处于被动，他为此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大加抱怨。还有两国之间的商业纠纷，也常常让他头疼。1899年3月28日，葛尔锡收到美以美会传教士孟存慈的投诉，称他们从中国人陈紫绥手上购买的“自动旋转纺纱机”专利权遭到侵犯。因为他们发现闽地退休官员龚易图在福州北峰开办的纺纱厂，其使用的机器原理系仿照陈紫绥发明的纺纱机，要求领事葛尔锡出面阻

止。于是葛尔锡进行调查，发现这位名叫陈紫绥的中国人于1884年发明了新式纺纱机技术，并在1898年向总理衙门申请注册专利，获得15年专利保护期。其后，美以美会的孟存慈、蒲鲁士和爱格尔三人合资向陈紫绥购买机器专利权。但龚易图在北峰纱厂所使用的纺纱机又不完全同于陈氏发明，因此他在跟闽浙总督许应骙的交涉过程中，也无法处理此事。于是葛尔锡请求对华公使康格照会总理衙门。但因为其中牵涉到在华传教士是否有权从事商业活动、两国间有关专利的条约不够明确细化等诸多原因不了了之。只是在纠纷过去4年之后，1903年，中方同意将专利保护列入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十款。

这些事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饭余闲谈，但对当时身处其间的人来说，怕是令人焦头烂额的棘手之事。于是在这些繁杂的外交事务之余，鼓岭上放飞自我的两个月就成了葛尔锡一家子最盼望也最愉快的福州记忆。

2

葛尔锡在鼓岭的候鸟行迹代表了鼓岭上的大多数洋人，他们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在仓前山，身份是领事，是洋行老板，是传教士，是高级打工者，每天要应付的是侨务管理与外交事务之间复杂关系，只有到了夏季最热的两个月，才可以卸下这些身份，全家一起投入欢乐的鼓岭度假之旅。



曾经的石头房子只剩残墙



透过这些石砌的院墙可见当年庄园的范围

100年过后，当我们跟着在鼓岭长大的向导郭庆，拨开齐身高的芦苇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到达筵席之地时，照片上葛尔锡的石头房子已经变成废墟，原本看似坚固的石头墙仅剩半截墙根，深秋时节，由绿转红的爬山虎爬满了这些断壁，村民在这些废墟上搭了瓜棚，种了佛手瓜，甚至喂养了鸡鸭。只有残存的低矮的石头地基，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格局。

早年间鼓岭的洋人别墅以石砌为主，多为单层（除禅臣洋行和万兴洋行为双层），一般就三四个房间，有壁炉、厨房、卧室、客厅，装修也比较素朴。山上没有电力和自来水，用的是煤油灯，下雨的时候用木桶收集雨水使用，或者雇人挑水。没有抽水马桶，只在一个盆子上面安了个座便成了简易的马桶，每天会有当地的农妇来

把粪便倒入田里施肥。雇用当地人挑水、倒粪便，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收入，也增进了外国人与当地百姓的日常接触和交往。在这里当大家以一种放松心情相处，彼此的关系也自然变得融洽，这大概也是葛尔锡的寿宴上为何出现那么多本地人的原因吧！

热爱园艺的外国人，通常还会在门口种上本国带来的树种，比如禅臣花园门口的南洋衫、棕榈树，还有火星花，园林总体突显西式风格。他们还不辞辛苦地修建起私人泳池、网球场，甚至规模宏大的跑马场，真正把鼓岭作为自己的家园，在这里举办婚礼、寿宴，正如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样子。多年以后，那些在门前的空地上吃席喝酒的中国人、外国人又去了哪里呢？照片上那两个光着头的中国孩子看向镜头的眼神似乎穿

越了100年的时空，他们看得到今天的鼓岭变成什么样子吗？

20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陆续离开之后，鼓岭上的石头房渐渐荒废。无主的房子总是难以抵御自然的侵蚀，来自海面的台风一刮就掀翻了屋顶，有的房子被当地居民们用来圈养牲畜，自然的、人为地，这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石头厝消失于时间长河之中。但是没有什么好感伤的。时间永恒，万物都成过去。100年以后，鼓岭以另一种方式再度地热闹起来。有的老房子被修复成为纪念馆，有的被精心布置成为优雅的咖啡馆、民宿，各种诗歌朗诵、艺术品展出、音乐会在这里举办。2015年，一出汇集了国内著名音乐剧制作人李盾、金培达以及美国百老汇、加拿大等地的艺术家，历时3年创作并打造完成的音乐剧《啊！鼓岭》在全国各大城市演出，由当下最耀眼的音乐剧明星郑云龙主演，剧情就是以曾经的鼓岭居民加德纳寻回儿时记忆为线索，串起两国人民间的动人友谊。这是对鼓岭上中外友人之间友爱相处的精神的复刻，又是一种发扬和延续，因为在这场集中了各国音乐界精英的合作与碰撞中，又诞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新的欢宴仍将流动着，延续着。

3

一个花园，一片树林，一面湖泊——我们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远离城市回到自然，

疫情的几年，让人与人的相处变得小心翼翼，只有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才可以无拘无束，畅快自由。于是周末我们总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帐篷搭在野外草地上。为此，鼓岭管委会专门将鼓岭柱顶一大片林地开辟为“湖畔露营区”，高山深林，有湖、有草坪，有金钱松、红枫、银杏、枫香、栎树、苦槠、板栗、竹柏、桂花等乔木，还有各种珍稀鸟类：灰胸竹鸡、颈斑鸠、斑尾鹃鸠、红嘴蓝鹊、大山雀、红头（长尾）山雀、画眉、叉尾太阳鸟、黄雀、白鹡鸰、白晨文鸟、灰头鹀、小白腰雨燕等上百种。百年前，外国人柯志仁、柯约翰父子就是在鼓岭完成了《华东地区550种鸟类》的最后章节，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华东地区的珍稀鸟类，他们认为鼓岭的鸟最漂亮。

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周末的时候在树下草坪搭上帐篷，还有很漂亮的彩灯闪烁在天幕边缘，小女孩穿着款式考究的小裙子轻盈地奔跑，几张折叠椅，一张长条桌，摆满了各种零食，亲友欢聚畅谈，耳畔鸟鸣声声风涛阵阵，身心都放松下来。

最早将这种生活方式带进鼓岭的，也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建立第二家园的外国人。即便缺少今天如此丰茂的植被与草地，老外们仍然在当年鼓岭上发现了很多风景优美的野餐地点，其中有一处叫日落石，在山顶离老泳池不远。在这里，居民们聚在一起野外晚餐，迎着日落唱歌。他们吃些什么呢？炸鸡、三明治、魔鬼蛋，还有家庭自制的冰激凌和蛋糕作为甜点。据当地人回忆，这



重现鼓岭上的野餐场景

些外国人只要一有机会便喜欢领着孩子在野外用餐，草地上铺上一片野餐布，篮子里装上丰盛的食物，孩子们尽可以玩耍，女士们穿着漂亮的长裙，男士们也加入其中，甚至西服皮鞋，穿戴得犹如出席盛典一般整齐。

野餐是家庭的聚会和社交形态，孩子们也穿着衫衣西装裤，打扮得很优雅。和今天热衷于拍照发朋友圈的现代中国人一样，当年野外欢聚的场面也随时被喜爱摄影术的老外用相机记录下来，保存到家族相册当中，由此才能带领我们了解彼时外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仅野餐，还有网球、游泳、骑马等，老照片里可以窥见当时不一样的生活。进入鼓岭的外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令当时鼓岭上的居民们大开眼界。比如他们在游泳池里洗澡，还男女同浴，他们打球、游泳、办舞会、开派对，盛夏的狂欢，没有焦虑与牵挂，每个人都优雅松弛，都舒展自由。翻看当时的老照片，很明显地



柱里湖畔露营地

区分出外国人和当地老百姓的不同，不是衣着不是肤色，是他们的神情，他们的姿态，所处的环境背景不说，当时的外国人确实更接近一种人的自然状态，挺拔、舒展、放松和自由。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也活出一种健康的姿态，更明白了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茁壮的，开放的，舒展的，时刻迸发力量与美的，才是生命的本色啊。

4

如果是夏季5月来到鼓岭，长田溪沿岸的花田铺满了大片的绣球花，蓝的紫的，听那花的名字：无尽夏！欢聚与笑声无尽，享乐与童年无尽，灿烂与热情无尽；满坡满谷，灿烂无边，时光无限。如同西方人的生命观：直接，热烈，散发着荷尔蒙，流淌着汗水。他们不如中国人这般婉转、隐秘。中国人也赏花，也热爱自然，但是



鼓岭绣球花盛景

不是赏物本身，而是赏一种意境一种寄托。因此，古典的中国审美观念里不爱硕大的绣球花开到荼蘼大片的色彩，更爱梅兰竹菊这些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因此在传统中国画或诗词里少见色彩艳丽的绣球。但向导郭庆说，鼓岭上的绣球花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八仙花”，花名来自“八仙过海”的传说，说是在八仙野餐时，何仙姑撒下仙花种子，所以名八仙花。而鼓岭上盛放的“无尽夏”这个品种实际属于八仙花改良的新品，花期比普通的八仙花平均要长10-12周，忍受低温的能力比普通八仙花要强，在较冷的环境中也能开花。伴随着它超长的花期，欢乐明亮的夏季似乎也被延长了，属于鼓岭的夏日之旅也被无限期延长了一般。

我们今天追慕中国古典文人的审美，也学习百年前的鼓岭外国人的生活方式：骑马、露营、野餐；中国人讲究意境、神韵，外国人要的是一

种蓬勃的、野蛮生长的生命力，绣球花刚好是这样的代表，粗蛮的，同时又是健壮的，天真烂漫的。在鼓岭上既可以见到大片炫丽的绣球花海，又可以在柱里景区那些密林中发现流苏、木槿、青梅、杜鹃以及曼珠沙华等中式花木，大约来自闽江上的海风和来自柱顶的落山风在这里汇集，让不同的植物在鼓岭上蓬勃生长着，正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很多天之后我还在想念那天的鼓岭之旅，一行人踩着松软的落叶，行走在树林中。我们深入到鼓岭不为常人所识的那一面，不厌其烦地去辨识脚下的一块界碑上的刻字，去寻找被枯草和石块掩埋的老井，去杂草丛生的野地丈量曾经的基石。我们到底在追寻什么？那些消失的，属于异域人的家园，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什么？

作为“闽都文化”的重要一角，与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等历史文化街区所呈现的士大夫文化或者商业、领事馆文化不同，鼓岭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放松的、欢乐的、热爱与享受生命的休闲文化。没有人不热爱美好的生活，没有人不懂得鉴赏自然的优美，我们追寻当年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再造百年前的一个梦——如果从物理条件来讲，今天的鼓岭比起百年前的鼓岭要丰饶美丽太多——我们所追寻的是一种超越古今中外的、所有人相通的，对生命与周遭世界的享受与赞颂：所有人放下隔阂，忽略社会性的标签，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投入这个乐园，共赴一场平等的欢宴。

一个“鼓岭人”在美国行医的故事

张又新

2022年7月23日，美国鼓岭文史研究会专家穆言灵和她的先生彼特，一早来波士顿接我去参加美国鼓岭外国友人后代“鼓岭之友”的聚会。那天我在聚会上简单介绍了鼓岭邮史，并且建议既要宣传外国友人在鼓岭、在福州所做出的贡献，也要宣传中国人在美国为美国人民和社会所做出的贡献，鼓岭精神所弘扬的和平、友谊和爱是不受区域限制的。穆老师夫妇以及到会的鼓岭友人后代都很赞同这一建议。

开完会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我在加州的老朋友余娟医生。余娟医生在美国当中医和针灸师已有几十年，病人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她不但医术高超，而且遇到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总是很乐意免费给人家看病，因此深受当地人的敬重。在车上，我把余医生的情况和经历向穆老师做了简单介绍。

余医生出生于福建莆田医生世家。她的爷爷余景陀曾经是兴化圣教医院院长；父亲余文光是中国著名的外科医生，担任过多年兴化圣教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而她的姑姑余宝笙是全



山东医学院毕业时的余娟医生

国有名的生物化学家和教育家，曾经担任过华南女子学院的院长。

余医生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前身为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在校执教，后在福州协和医院担任多年麻醉医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她和先生一起自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她先是通过了外国医学院毕业生的资格考试（ECFMG），后又考过并获得中医执照。她曾经是1958年中国卫生部建立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的成员，经过两年半正规中医学习后成了当年全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生中的一员。为了传承祖国的中医，她曾就职于美国Santa Barbara中医医学医院，教书育人。这期间，她认识了中医泰斗陈可冀院士，并共事了半



1940年余医生家三代在鼓岭拍的全家福。前排右2为年幼的余医生，后排右4母亲高振珍，右5爷爷余景陀，左3姑姑余宝笙，左4父亲余文光

年多。此外，她还在加州创办了 Santa Barbara 中医和针灸诊所。

听了我对余娟医生的介绍，又听说余家在鼓岭曾经有一栋别墅，从前，余医生常和爷爷、爸爸等家人到鼓岭避暑，穆老师兴奋地说：“威廉，这真是一个鼓岭人在美国的好故事呀！”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加州的余医生，希望她能够给我讲讲在美国行医中遇到的感人故事。余医生说故事倒是有不少，就不知道是否感人和富于鼓岭精神。于是她抽空为我写了四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20世纪90年代，美国医生基本上对中医持有反对的态度，很难想象中医能够治病。

有一天当地颇有声望的一位美籍日本外科医生走进我的诊所，他说他的父辈知道中医，想问我一下，他的一个刚刚开完结肠手



余医生和中国中医泰斗陈可冀院士（福州人）

术的病人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并发症。他说病人恢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胃出了问题，食欲全无，一有食物入口便恶心呕吐，连水都喝不进去。手术前查过胃，一切都正常。这个病人在医院已经三天了，本来想送去加州斯坦福大学医院，但是因为感恩节不方便转送。他还说这病人有可能要切除胃。当天他把这病人用救护车送到我的诊所。当时我只记得病人舌苔又黄又厚，就像涂上一层奶酪。

我给他当场配了一副清热燥湿的方子，并在诊所熬好。因加了黄连，我对病人说药很苦，要一口一口慢慢喝。那位日本外科医生有点紧张，他说这么苦的药这病人肯定越发呕吐不止。没有想到病人喝了很顺利，剩下的我让他带回病房。次日医生打来电话说



余娟医生在加州诊所大门前

有了奇迹般的转机，病人开始进食了。后来家属每天来取药，五天后病人全好而且出院了。这个病例说明中医的疗效绝不是巧合。

多少年后，这个病人还常常带了家人朋友来看我，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本地一所万规模男性监狱的头头。他一见到我就开玩笑地笑着说：“余医生，当年您给我煮的又黑又苦的中药是我一生中最好喝的一碗汤，因为这汤治好了我的病。”我也笑着向他解释为什么中药这么苦，以及什么叫“良药苦口”。

第二个故事：我的诊所在美国几十年来，有不少不孕症患者求医，其中成功怀孕者不少。她们来找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不孕不育的西医知识比较了解，例如排卵障碍或黄体功能不足等，所以病人肯配合中医治疗，而且相信我。

我第一个成功的病人叫安，是当地律师

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她来看病时已经40岁了，从来没有成功怀孕过。毕竟她已经40岁了，为了争取时间，我劝她预约一下外地的不孕专科医院，使用试管婴儿技术，当时预约时间要三个多月。我根据她提供的资料，如基础体温曲线等，按照月经周期给她实施针灸和中药治疗。两个多月后，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突然门口开来了一部汽车，只见安手捧一大束鲜花，高兴地抱着我大声叫喊：我怀孕了！接着就告诉我做试管婴儿的预约也取消了。后来她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大学毕业时，她还带到诊所看我。

第三个故事：这里还有一个菲律宾籍护士，她的美国白人丈夫是湾区IT工程师。他们曾经试过两次试管婴儿，均以失败告终。记得那天夫妇俩一起来。她说，已经花掉了近5万元美金，采用各种各样的检查和方法，都没有受孕。丈夫在湾区听说中医可以试试，于是就抱着中国人常说的“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来咨询一下。我也郑重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不敢承诺什么，但是会尽力，因为病人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后来病人非常合作，第三个月就怀孕了，如愿生下一个儿子。次年她又自然怀孕，成功地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第四个故事：我的丈夫老刘于1992年因为得了膀胱癌，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做了小肠代膀胱手术。手术后恢复得还好，但是



余景陀家族在鼓岭的别墅遗址（摄于2012年）

多年来常常有泌尿系统感染，这是一种手术常见并发症，他因急症住过多次医院，肾功能不全，并且一年不如一年。2017年住过ICU，下过病危通知，最高的肌酐值是2.9。经抢救后，渐渐好转，但肌酐值在2.5上下。我带他去看了Dr. Moley，这位老外专科医生是我的针灸病人，腰疼一发作就来针灸，我们成了朋友。我和他讨论了老刘的肾功能。他说老刘的肌酐等指标都是三级的肾功能衰竭，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逆转，只能希望不要再加重，否则只好做肾透析了。不过他很信任我，同意我用中药来治疗。今年老刘90周岁了，这两年的肌酐都在1.7左右，没有超过2.0的。这位肾科医生说：你不用带他来看了，你怎么治疗，就继续治吧！看来他已不需要透析了。最近看了内科医生，Dr. Javitz说他没有三高，肾功能比五年前还好，以前每三个月去看他一次，现

在改成每半年一次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中药一天两次从未停过，或许只能归功于中药了。

看了余医生写的故事我很感动。我想起百年前许多美国医生，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为中国百姓治病和传播西医医术；而百年后，余医生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应用她的中医医术治好了许多美国人的疑难病症。我告诉余医生：“您的故事很感人，很富有鼓岭精神，您为繁荣祖国的中医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余医生感慨地说：“我的故事很平凡，绝大多数在美国的华人医生都会这样做的。百年前美国的福益华等医生抛弃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不远万里来到福建山区并奉献出毕生精力，相比之下，自己还很是做得不够啊！”

如今余医生已是古稀之人，早已退休，但她仍然不忘初心，依旧在网上替病人看病配药。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

我的奶奶林宗素

汤明口述 郭大路整理

我和奶奶的相遇，是在 1938 年。

那年，奶奶 60 岁，我 8 个月。父母离异，我被父亲从上海送到了昆明，留在奶奶身边。

1. 童年抗争

奶奶的名字叫林宗素，她是清朝光绪四年（1878）生人。那年代，福州读书人家的女儿，很小就要缠足。奶奶跟我说过童年裹脚的苦：她一个小女孩子痛啊，整夜地哭。妈妈心疼，拿一盆冰水给浸一浸脚，也只能减轻一点儿痛苦……奶奶气不过，不久就自己偷偷放了脚。我见过奶奶的脚，虽然放了多年，但趾骨已经被缠歪了，中间有一只脚趾头是叠在大拇指上的。个头高挑的奶奶，一双脚才二十八九码，也就 7 岁小女孩那么短。但在那年代，这已经是“中脚”了。我



林宗素

看到的奶奶，晚年时候走起路来，啪嗒啪嗒还挺利索。

奶奶在昆明的家很大，我常在家中自由奔跑，奶奶常常怜惜地看着我。女性走路的自由，奶奶那一代是要抗争才能得到，到我这一代，是生来已有的权利了。

奶奶宠我。可是在一件事情上，她是很严厉的：每次我摔了跤，跌倒在地上，都不准任何人

扶，也不准我哭哭啼啼，一定要我自己站起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以说，塑造了我怕困难的个性——我长大后，到农村、工厂，到很多艰苦的地方，受过很多打压折磨，从来都乐呵呵的，割麦子啊挑担啊都行，干得还挺欢。后来当了老师，我也像奶奶一样要求学生，很多事，总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因此我的学生都很独立。这样的教育，是奶奶传给我的。

2. 青春放飞

奶奶放小脚的事，是我的舅公、她的哥哥林白水的主意。林白水（1874-1926），是中国近代史上和邵飘萍齐名的著名报人。1901年，他在杭州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编，为了把我奶奶、他最疼爱的小妹妹林宗素带出来，还搭上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

林白水19岁那年，母亲去世，他便去了浙江读书，寒暑假则回福州看父亲、妹妹。一次，林白水和父亲商量，要把妹妹带到杭州去。父亲



林白水

问：你们都远走高飞，谁服侍我呢？

父亲提出的放行条件，就是要林白水娶妻生子。1900年，林白水遵从父命，在福州和一名陈姓女子结婚了。1901年，陈氏生下儿子林陆起。而奶奶，因此得到了允许，跟随兄长到了杭州。

林白水把妹妹安置在浙江教育会里，还把她介绍给秋瑾，让她跟秋瑾学习，后来她们俩成为很好的朋友。不到三个月，妹妹就变得大方勇敢，毫无腼腆的姿态了。

这些事，是我的姑姑林蔚君（林白水女儿）记录下来的。在我长大些的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上四五个女子，秋瑾是我认识的，站在秋瑾边上，手叉着腰英气勃勃的女孩子，父亲说，这就是你年轻时的奶奶。

从杭州，到上海，年轻时的奶奶受章太炎夫人汤国梨邀请同办“爱国女学校”，她也跟着哥哥林白水办报，甚至敢于四处演讲了。我常常想象奶奶当时奔放的样子——我记忆中的奶奶，个子蛮高的，皮肤很白。宽宽的肩，胸部丰满，双眼皮儿，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有一次，我看见她穿着紫红色的丝绒旗袍，披一件毛皮坎肩，美极了。我想她年轻的时候，一定还要美得多。在姑姑的记忆里，我奶奶年轻时“很红”，很多人追求。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在1903年见过奶奶，一直没有忘记她，多年后，他还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又认识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我们刚从闭塞的四川出来，看到女子出洋留学，本来就已觉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辞，说的又

全是革命的道理，更使我们感到佩服。”

奶奶在杭州订了婚，对象胡先生身材高大、相貌非凡。可是，奶奶不肯立即结婚，她打算跟着哥哥到日本留学，读完书后才结婚。不久，她就因为思想激进遭遇了退婚。

1903年，奶奶跟着哥哥林白水一同赴日。那年俄国侵略中国，奶奶与十几位留日女学生共同组织“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当时国内报纸都记载了这次行动：“留日女学生十数人，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于4月8日成立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以拯救吾国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奶奶成了在日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如果只是谈谈革命，她未来的婆家可能还愿意容忍，可是她提倡女权，公然赞成两性解放，婆家就没法接受了。有一次，奶奶在近千人的留学生大会上演讲，题目是《女权》，她说，“二千年来，两万万女同胞的奇耻大辱，莫过于娼妓之存在。我以为仅仅废娼，还不能尽雪前耻，将来我们要报复，他们过去怎么玩女人，我们也要怎么玩男人……”如此大胆出格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现场骚动。第二天日本的报纸上，就登出来她的这场演说。消息传到杭州，婆家很生气，她的婚约就解除了。

1904年春天，奶奶从日本回国，林白水正忙着办《警钟日报》和《中国白话报》，奶奶在这两个报馆都当过编辑、记者。她成了清末最早的女



《警钟日报》

记者女编辑之一。我小时候，看见过奶奶的派克笔，也见过她写文章的样子。那笔在她手里，是一气连下去写的，中间没有停顿。她是像她哥哥林白水那么才华横溢吧？

1905年，奶奶再次东渡日本，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年秋天，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奶奶和秋瑾、方君瑛（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暗杀部部长，参与过刺杀摄政王载沣）、陈撷芬、唐群英、蔡惠、吴木兰等积极参与，被称为“苏菲亚式女杰”——苏菲亚·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出生于俄国贵族之家，1881年组织并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年12月，奶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早期女会员之一。

3. 新式婚礼

在姑姑的回忆里，奶奶到近30岁才结婚，结婚对象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汤忠。这场婚礼1906

年初在福州举办，全城轰动，因为，这几乎是福州第一场新式婚礼。

婚礼上，新郎汤忠穿西式黑色燕尾大礼服，新娘装是粉红缎拖地礼服，由奶奶亲手缝制。粉红色是因为她父亲坚决不让穿不吉利的白色。新婚夫妇不拜天地，也不给家族长辈磕头，只向父亲、证婚人及介绍人各行三鞠躬礼。行礼之后，宣读结婚证书，双方盖印，交换戒指。哥哥林白水作为介绍人，把妹妹在杭州、上海、日本所做的许多爱国行动都报告了一遍，并且告诉来宾，新娘子很善于演讲。所有的来宾都大为惊奇，兴奋地要求新人报告恋爱的经过。

汤忠为人腼腆，只说了几句，奶奶则大大方方告诉大家，她因为汤忠写的情书非常动人，因此决定和他结婚。奶奶结婚的事，是姑姑辗转听来的。姑姑说，新娘演讲，大概也是福州空前的事！

汤忠就是我的爷爷。婚后，奶奶同爷爷一起到上海去。生下两个儿子后，奶奶仍然热衷革命，提倡女子参政。

4. 参政失败

1911年武昌起义后，奶奶在上海被推选为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在宗孟女校设置法政女学课程。奶奶发表文章，认为“感共和既成，正是一改五千年沉痾，实现男女平权的历史机遇”，所以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力

量，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参政同志会特别要求“临时政府准起会员国会开会时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女界团体选举议员”。

那时候，社会舆论和革命党内部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女子参政。1912年1月5日，奶奶作为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专程前往南京谒见孙中山，诚恳阐述女子参政的迫切要求，希望得到支持。在交谈中，孙中山对“成人女子完全参政权”口头赞同。

奶奶很兴奋，马上在《民立报》和《申报》披露这一消息，却引来了滔天口水。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和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迫于舆论，孙中山只得一边肯定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边声明女子参政权须等“将来”方能实现的想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参议会制定《临时约法》。奶奶和积极倡导女权的唐群英等，向临时参议会郑重提出要求，希望将男女权利一律平等、同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内容明确写进《临时约法》。然而，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偏偏删掉了“男女平等”这四个字。女人们5次上书临时参议院，都没有结果。1912年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天，愤怒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大闹参议院，这些在革命中身经枪林弹雨的妇女，闯进参议院，毫不客气给了法制院

院长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女子参政运动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

1912年4月24日，当女权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奶奶和唐群英、吴木兰在上海张院举行了秋瑾烈士追悼大会。她指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奶奶是借秋瑾的精神鼓励女性继续革命啊。

女子参政运动轰动一时，随即不了了之。这时爷爷对奶奶意见满满：爷爷认为自己在北洋政府里已谋到了高官，奶奶应该退居家中，相夫教子。奶奶却直接对爷爷说不。

爷爷非常生气，婚姻的裂缝因此产生。到1913年，他俩登报离婚。倔强的奶奶净身出户，一无所有地去了新加坡。几年后奶奶回到上海，托人找过爷爷，要求看看两个儿子，爷爷无情地拒绝了。

5. 资助办报

奶奶到新加坡，是去创建学校办教育的。她当了校长，兼任教员。学校里有一位和她年龄相近的张客公先生，帅气英俊，善于交际，人缘和

口才都极好。后来他和奶奶结了婚。

张客公对经商很内行，奶奶和他在一起，也学会了做生意。他俩一面教书，一面经营药材和其他货物的生意。不到十年，奶奶已经相当富有了。1915年，奶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国光。

在新加坡发了财的奶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哥哥林白水。1920年7月，林白水在上海的《平和日刊》报馆被军阀派人砸毁，报纸也被迫停刊。奶奶在新加坡听到消息，立刻汇去500大洋给林白水，作为报馆的开支。奶奶写信说，“你的报也是我的报，我是股东之一……”从此她每个月都寄来二三百元大洋。那时的二三百元，够在北平（北京）买个很不错的房子了！

奶奶为什么要不断接济林白水办报？除了手足之情，也许还因为哥哥林白水的报纸，在那浑浊纷乱的世界里，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弱者大声疾呼，反抗强权。奶奶年轻时的理想，到那时候，只能通过资助办报来实现了吧。

1925年秋天，奶奶的小儿子因体弱多病夭折，她非常悲痛。当时林白水正在北京办《社会日报》，与军阀针锋相对，影响很大。林白水叫妹妹搬回北京，以便照顾她。但没有多久，1926年8月，林白水被军阀残酷枪杀，以身殉报。奶奶痛失至亲。

我小时候，总有很多人来看奶奶，每次提起林白水，奶奶都会流泪。她这一生，事业、婚姻、亲情，都受到太多的打击。

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奶奶每天要我背给她听的古文：“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是她认定的做人的道理。

晚年的奶奶头发短短的，她常常坐在窗前，腕上一对绿色的翡翠镯子，手里总离不了书。

那对翡翠镯子，后来没有了。

怎么没有的？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早年给奶奶拉车的，是位老车夫。到了年龄，奶奶让他退休养老。抗战胜利后的一天，我在家里又看到了老车夫，他跪在奶奶面前，哭着把头磕得砰砰响。原来，他唯一的儿子在街上，被美国人横行的汽车撞成重伤，要好大一笔钱才能救过来。我看着奶奶把手上那对翡翠镯子褪下，交给老车夫，说，你去，拿到洋行里去，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东西，他们会多给你钱。

后来，人家说，那对翡翠玉镯当了1000大洋。车夫的儿子救回来了。

在奶奶寂寞的晚年，她仍然没有忘记革命的初衷：恤助弱小。

6. 身后事

很多史料上说我奶奶于1944年去世，那是

不对的。奶奶在1946年去世，那一年我8岁。

奶奶去世时，我就睡在她怀里。她走得很安静。

那天早上，来了很多人。人们抱我起来，说老太太没了。他们把我放在房间的椅子上，我看着他们给奶奶洗了、擦了，我还安静坐着。到他们把奶奶放在棺材里，我就急了，拼命抓棺材，抓得满手是血，不让奶奶下棺。人们就把我关到一个黑屋子里，我撞门，扒地板，最后昏过去了。等他们找到我时，我只有一口气了。什么是生离死别，8岁那年我就已经知道了。

退休以后，我去过几次昆明。我希望在半个世纪后找到奶奶的坟墓，我想把奶奶带回她的故乡，让她和最爱的哥哥林白水在一起。我甚至连司机都预先请好了，但是当地的人告诉我，开发的那些年，所有外来无主的坟墓，都已经迁走，不知所踪。奶奶的坟墓并不例外。

2008年，我回了一趟福州，到了闽侯青圃，像做梦一样，见到了奶奶的故乡、她出生的小村庄，听见人们说着故乡的方言。我想起奶奶在昆明的晚年，她高兴的时候，也说说福州话的。有一句福州话听起来像“写笨”，我至今记得，那是“吃饭”的意思。



闪耀在外交第一线的罗家后辈

方 麒

福州南营，位处市中心东街附近。百年来有一个显赫的学霸家族从这里走出——豫章罗氏新梅公宗族。南营罗家自罗丰禄开始，四代皆出著名外交官，是当之无愧的外交世家。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南营罗家有 20 多人活跃在翻译和外交舞台。

这次，我们先认识南营罗家七房罗丰禄儿女辈，以及长房罗天禄儿孙辈中的外交人才。

罗丰禄一支的外交人才

罗丰禄的妻子魏琼恣，是他在马尾船政时的同学兼好友、中国近代著名造舰专家、船政工程处总工程师魏瀚的妹妹。魏琼恣在魏家排行第六，被罗丰禄亲昵地称为“六妹”，她从罗丰禄初次出洋留学时起就一路相随。两人共育有三个女儿，五个儿子。

罗丰禄的大儿子罗忠诚、二儿子罗忠诒、三女婿魏子京，后来都成了驻外公使。而 1896 年罗丰禄出任驻英兼意、比三国公使时，跟随身边的



南营巷今景

除了妻子，还有这两个儿子。

因其他年幼子女在家乡无人照顾，临行前，夫妻俩特意到妻子的娘家挑选了一个妹妹让她帮着照看儿女。这个名义上是续弦的小魏姑娘，后来在罗氏夫妇去世后，带着他们的孩子用罗丰禄留给她的钱搬出了南营老宅，买下了罗园居住，并在若干年后，供他所有的男孩都上了英国剑桥大学。



罗丰禄五个儿子（皆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与二女儿青少年时期合影（池志海供图）



如今立新路上的罗园是20世纪50年代政府收走老罗园后拨给的

当年的老罗园现在只留在老照片中了，宽敞的雨廊，华丽的大厅，还有假山和鱼池，地势极佳，坐到树上可以俯瞰当年的整个福州城。老罗园的二楼，还放满了罗丰禄收藏的各类中英文书籍。而这些都成了找不回的过往。



罗忠诚

如今立新路上的罗园是20个世纪50年代政府收走老罗园后拨给的。

罗丰禄的长子罗忠诚，字仪重，又名宗贤。他曾任中国驻伦敦副领事、福建交涉署交涉员、福建省外交科科长。

值得一提的是，罗忠诚之子罗孝建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一样，同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二战”期间，还成为英国BBC广播电台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播音员，后任中国驻利物浦总领事。罗孝建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突出贡献，曾获“英国名作家奖”。

罗丰禄次子罗忠诒（1887-1960），字仪元。他是清法政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后留学英国，获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学位。

1914年，罗忠诒任驻英使馆一等秘书，代办驻英使事。1920年先后被任命为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清华学校校长（未到任，当时其外甥陈岱孙正就读于清华高等科四年级）、驻秘鲁公使馆一等秘书并代办使事兼总领事。

1924年，罗忠诒任国务院秘书。两年后，又



1920年3月6日，罗忠诒（右二，左二系魏媯）抵哥本哈根出任中国驻丹麦公使，丹麦女皇（中立者）欢迎中国公使并合影

任驻丹麦公使。1928年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在荷兰召开时，罗忠诒出席了大会典礼，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正式代表。

结束驻丹麦公使任职后，罗忠诒回国供职于外交部，并于1934年担任国联第十五届大会代表。1956年，罗忠诒结束了外交生涯，转而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至1963年因病逝世，享年77岁。

魏子京是魏瀚长子，1913年从船政前学堂第四届制造班毕业，因学业突出，曾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四批出洋留学生，赴法国、比利时学习。由于英文、法文奇佳，加上处事机敏，善于周旋，且长相英俊倜傥，曾在海军界做过翻译官，后转入外交界，一直做外交官。

1915年，北京政府任命魏子京为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负责主持云南对外交涉工作。1917年出任驻澳大利亚第五任总领事，其间积极维护

和改善在澳华侨的利益，努力交涉中国赴澳留学生问题。1929年，魏子京被任命为驻秘鲁使馆一等秘书兼代办使事，并兼理总领事事务，1931年升任全权公使。曾积极与秘鲁政府沟通，使其做出了不承认日本伪满政府的承诺，并为全力护侨而积极奔走。

魏子京后来移居加拿大，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过世。

当然，除了前述三位外交人才外，罗丰禄的另外三个儿子同样也有各自的成就。四子罗忠詠，是铁道部工程师；五子罗忠诒（字仪姚），曾任福建省政府外交部门秘书，以及厦大、福建学院教授。

罗丰禄的三子罗忠谏（1888—1963），字仪朱，毕业于剑桥大学外交政治系。他回国后曾在福建及河南交涉员公署任科长，1926年至1941年的15年间，则一直担任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委员（堂长），他也是最后一任堂长。

1941年，也就是在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堂长的任上，罗忠谏被日军关进了监狱，受尽了各种虐待。但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日军施加何种诱惑与迫害手段，罗忠谏也绝不答应任伪“厦门市高等法院院长”一职。经家人多方努力，罗忠谏最后得以保外就医，而后逃离厦门回到了家乡福州。

后来罗忠谏被任命为福州和闽侯地区公证员。只不过，因受日寇虐待身体受到创伤，加上年事已高且有心血管病等，罗忠谏卧床多年，于



罗忠湛



罗忠尧



罗旭

1963年逝世，享年75岁，被安葬于罗家祖地。

罗丰禄大哥罗天禄的次子罗忠尧，以及罗忠尧的孙女罗旭及其夫婿赵稷华，也都曾在外交战线上尽显风采。

罗忠尧（1863—1909），字叔羹，南营罗家长房罗天禄之子。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第七届驾驶班毕业，先后在扬武舰见习、任福胜炮船大副。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罗忠尧随舰参战。

1886年，罗忠尧作为海军第三届出洋留学生，从香港出发，前往欧洲。抵达英国后，罗忠尧经陈季同推荐，到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两年并在英公司遇尼外耳及金士哥利书士院学习一年，“张秉珪、罗忠尧学习拉丁文字及英刑司各种律例、海军捕盗等项公法，皆深知旨要”。

罗忠尧回国后，于1890年赏加三品衔，派充日本神户西文翻译官；1895年，充任中国驻英三等参赞；1897年赏加布政使司衔，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899年充任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1902年，清廷“以南洋官商，捐款赈济陕灾，赏新加坡领事罗忠尧花翎”。1905年，罗忠尧主持福建

矿务总局工作。四年后病逝。

罗旭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谙熟英、法两国语言，后进入外交部，成为外交部为数不多的能同时运用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高级译员，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陈毅、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72年至1975年间，罗旭曾多次出席各种重大国际会议：1972年秋，随副外长乔冠华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翌年早春，随外长姬鹏飞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影响了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的结束；1974年暮春，她作为副代表，随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参加了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翌年仲秋，再度以副代表身份出席第三十届“联大”会议。

1972年12月12日，周恩来出席非洲国家驻中国使节举行的招待会，罗旭做翻译。

罗旭的丈夫赵稷华同样也是出色的外交家。他195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国际问题

研究所一室主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等。

在香港回归的重要时刻，罗旭与赵稷华均参加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赵稷华担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为香港顺利回归与英方代表斗智斗勇，最大程度上为国家争取到尊严与利益。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就是由赵稷华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的。

“弱国无外交”，相比于他们的祖父辈，罗旭与赵稷华的外交生涯，开始于中国站起来之时，成熟于中国日益强大之日，不可谓不是一种幸运。

世家开阔，代有才人

南营罗家的英才实在太多了，难以一一尽述。而这个家族之所以如此群星荟萃，或许还得归功于罗家先辈开放的心态。

自鸦片战争起，西风东渐，始及福州，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罗家深受影响。较许多世家来说，罗家更尊重个人选择、推崇男女平等，所以从罗丰禄那一辈之后，罗家不论男女皆列入排行，并同时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比较尊重子女的个人选择。即使家道中落无力上学，也会设法教给女儿识字算数，认知天文地理。

知识分子群集的南营罗家，以开阔的眼界与心胸，成为时代的中坚。

在此，再认识两位罗家的英才。

罗忠忱（1880—1972），字建侯。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后进天津中西学院、北洋大学机械系。由总教习丁家立荐送留美，入康乃尔大学土木系研究院深造。

1912年回国后，罗忠忱于是年8月到唐山交大（今西南交通大学）任教，成为该校讲授理工科课程的第一位中国教授。

罗忠忱学识渊博，到校后曾讲授应用力学（现在称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天文学、河海工程等多门课程。由于他在工程力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1917年以后，专职教授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直到1952年离开讲台改任研究教授。他在唐山交大讲授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达40年，被交大尊称为五老之首。

罗忠忱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的学者、专家和高素养的工程技术人才，包括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港工专家谭真、铁路桥梁专家汪菊潜、建筑工程结构专家林同炎，以及著名力学专家林同骈、张维、刘恢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严恺、谭请夷，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陈能宽、姚桐斌等，不仅桃李盈门，硕果累累，而且使唐山交大享誉全球。

2006年5月14日，西南交通大学举行建校110周年校庆，特在犀浦校区为罗忠忱立纪念铜像。

1972年，罗忠忱以92岁高龄去世，茅以升泣撰挽联：“从学为严师，相知如契友，犹记隔海传书，力促归舟虚左待；无意求闻达，有功在树

人，此日高山仰止，长怀遗范悼深思。”

1988年，罗忠忱的四位子女捐资3万元（其时全国人均月工资仅30多元，所谓“万元户”少之又少），和其他校友一起重设中断的“建候奖学基金”（1932年设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福州人名字命名的大学奖学金），以承父志，1990年起每年评奖一次。2006年，郭日修又为该基金捐款10万元。

郭日修，罗忠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罗忠忱小女儿罗榕英的丈夫）。

郭日修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在唐山工程学院、清华大学任助教，1950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第二海军学校讲师、教研室主任、舰船工程系主任，海军工程学院（现海军工程大学）舰船工程系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导，亲手带出了海军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中，他为我国船舶结构力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军著名的船舶结构力学专家，是我国舰船结构力学学科创建人之一。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还有一位要特别提及的是罗玲，著名的桥梁专家。

1963年罗玲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道路与桥梁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市市政设计院，从事桥梁设计；1987年起任该院副总工程师。

1974年以来，她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北京的



罗玲

“东厢”“西厢”“南厢”工程，“西北二环”改造工程、东三环工程、西客站道路工程、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西北三环改造、京石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共100多座立交桥的设计、审核、审定工作。这么说或许更直观些——罗玲81岁时退休，而在她退休前，北京所有的立交桥几乎全是她设计的。此外，她还参与了北京轨道交通的设计工作。

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当选为第九、十届北京市人民代表，1992年当选为十四大代表。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管理、科技专家”、北京市共产党员“十杰”。1994年还被建设部命名为设计大师，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第一届“中国十大女杰”。

南营罗家，不仅有着光辉的历史，令人欣慰的是，家族家风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继往开来。而今，罗家鸿宇辈也已经开始成长起来并崭露头角，逐渐显示出其强劲、向上的势头。南营罗家的辉煌历史，也将继续被书写。

石上的叶向高

青色

在闽侯县青口镇常思岭，路旁一块不起眼的乌青色碑石上，晾晒着刚采摘下来的几把豆角。

豆角遮掩的碑上，隐约可见几行大字“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叶公神道”。

这赫然是明朝首辅叶向高墓的神道碑。

坟墓早年遭盗挖后，神道碑被遗弃路边。正面阴刻的36个正楷大字，是一串串彪炳史册的功名，也是叶向高的盖世功勋。

谢政归来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州府福清人。明政治家、文学家，“独相”7年，首辅四载，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辅臣。

万历中后期，皇帝怠政，万事不理，朝政

几乎瘫痪。诉不尽的异象与荒诞，充斥着那个时代，也缠绕着这位“一身当天下之责”的独相。两次共129道的乞归之疏，终得二度归田。

1614年至1621年，叶向高第一次告老归乡。在这个不长不短的7年里，闽都山河留下了他的不少足迹。

“叶相”，这是家乡父老至今仍念叨在嘴边对他的敬称。壬寅年的酷热夏日里，我追随“叶相”的行踪步履，寻访了福州芙蓉园、乌石山，福清豆区园、瑞岩山、石竹山，长乐晦翁岩……摩挲着叶向高遗留的摩崖石刻，感受着从权力巅峰归来的“独相”在家乡7年的雪泥鸿爪与他的精神脉络。

在瑞岩山，叶向高的摩崖题刻因年久未描红，略显暗淡，个别字眼已漫漶难辨。匆匆而过的游客，没几人会留意到这位昔日权倾朝野的

“独相”的诗文与书法。

目前能觅到的叶向高摩崖石刻有两幅，《谢政归来》和《游瑞岩》。《游瑞岩》一诗，是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秋，叶向高与友同游瑞岩山所题。诗中尽情渲染瑞岩山的美景妙石。暮间，雾起，“引觞迴间溜，改席坐松风”，他们饮酒畅谈，秋碧江静，红透的夕阳，穿过疏林。好一幅美好画面！

那时，叶氏举家刚迁往福清县城，儿子叶成学得荫尚宝司丞。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叶向高启程返乡，行至杭州时，闻叶成学得病，即日夜兼程。岂知“余归而儿亡”。十二月初三到家，“儿亡已两日，竟不及见”。白发人送黑发人，何等悲痛。

叶向高育有三子，次子、三子在幼年皆因天花而死，长子叶成学是唯一长大成年的儿子。

次年二月，安顿好家事后，叶向高邀护行使者礼部主事熊文灿，同汪令尹泗论、吴指挥应珍，登瑞岩，留诗一首：

使节相将万里遥，名山还喜驻征轺。
青萝洞里扞残碣，绿树亭边看晚潮。
花鸟总知春事好，林泉偏觉圣恩饶。
扶筇更上层台望，缥缈彤云护紫霄。

瑞岩山有叶向高太多的记忆。少时，家穷，居无定所，常到瑞岩山附近放羊，并在崖壁下的寒洞里苦读。叶成学在父亲的读书处，留下了“第一洞天”摩崖题刻。这也是叶成学留在这世间唯一的摩崖题刻。



福清瑞岩山叶向高《谢政归来》诗刻

一切历历在目。沧海桑田，面目全非。国乱，无能为力；子丧，猝不及防。国事、家事皆锥心。或是儒家隐忍的性格使然，或是有皇家使者在侧，叶向高的字里行间，几乎看不见半点悲痛，尽是岁月静好，圣恩丰饶，彤云护紫霄。

福 庐 山 人

第一次谢政归来的叶向高，顶着圣上亲赐的



福清豆区园闲云石

太子太师头衔，八抬大轿，御差官员护送，荣极一时。赐白金百两、彩缎四表，表里大红坐蟒一袭。此等荣耀，福清至今无人超越。

看不清昏暗轿中叶向高的表情，但我相信，踏上回归故里的那一刻，他的心一定是放松和喜悦的。

自此不必再“隐忍，含羞在位”；不必再“茫然莫知为计，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无可奈何，又复沥情苦告，展转支吾”；不必再为“户部尚书以边饷匮乏无可设处，困苦悲号几无生趣，日来控诉于臣。工部又以赏夷无措求借兵

部。光禄寺又以供应难支求借户工二部，彼此相怨相尤”而自责、窘迫。时至今日，我读着这一段段含泪乞诉的奏疏，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无力的挣扎与心酸。

而今，一切都放下了。多方调和，苦心支撑，依然无法拉住即将倾覆的大厦。归来，做一个纯粹的田园诗人吧！

从此，他归隐山林，如龙似鲤般遨游于家乡的山山水水。

他喜欢石头，万历皇帝曾赐他一块石头。传说是越南国王进贡的两块石头之一。在福清豆区园书院后厅，我见到了这块巨大的石头，状如云朵，上刻有叶向高的“闲云”二字。

这是一朵自京城飘回的云朵。

距离福清县城30里的郭庐山，有千奇百怪的山石。归田后，门人何玉成第一次带叶相去赏游时，叶相便爱上了那里。他决定和里人共辟郭庐山。“结檀越十余人，募金鸠工，剔其芜秽”，历七载，郭庐山终于成了“钜丽甲于八闽”的名山。

叶向高将郭庐改成福庐，言“吾省与郡邑皆名福，里亦名福唐，故更名福庐”。福建福州福清福唐福庐，五福俱全，祈愿家乡广纳天地之福。自此，“筑室于山之坳，曰石隐山房，每月辄一至”，与朋友们文酒唱和，留下了不少游赏福庐山的诗文。

一切云淡风轻。

山居无事，他开始梳理和检阅自己的过往。

曾经的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有关“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留存，待至他日，或可考可用。作品《苍霞余草》，也开始撰写。叶向高的“苍霞草”系列，以福清灵石山苍霞亭命名，共四部，这是继《苍霞草》《苍霞续草》后的第三部。

每个月一次的山林生活，无法满足一颗向往大自然的心。此刻，苏州的拙政园、留园，无锡的寄畅园，声名鹊起。江南私家园林的营建掀起高潮。偏居东南一隅的叶向高也把山林搬回家。他买下已破败的芙蓉园，把自己对山林、对石头的热爱，注入后花园的营造之中。他从江南采购了大量太湖石，一部分留在芙蓉园，一部分送回福清老家。其中，最大的假山石“波罗牙”，经过南门兜城门时，压断了一条门槛。为此，叶家赔了300两银子。

叶向高在《福庐灵岩记》中自言，天启元年（1621）重入内阁后，“驰驱三载，梦寐无日不在兹山（福庐山）也”。

自此，他自号为“福庐山人”。

山中相国

叶向高毕竟不是一个纯然的文人，他还曾是朝堂上的“独相”。

历史，可以被风吹散，可以被施政者篡改，刻在石头上的心事却无法磨灭。

除了瑞岩山，叶向高在石竹山、连江青芝



福清石竹山叶向高摩崖石刻

山、长乐晦翁岩、福州乌石山等尚有摩崖石刻留存。

当我重循当年叶向高谢政归来留下摩崖石刻的路，看着那一首首几被封存的漫漶字迹时，眼前出现一个长须拂然的长者。他微笑着，眼中忽而悲伤，忽而激愤，忽而又收回，重归平静。

无处可诉的心迹，是否只能隐没在黑夜和长风中？或许，还可把它吐露给静默无语的石头。石竹山上，在祈梦“仙告以腰系白玉带”的地



乌山天秀岩叶向高摩崖石刻

方，叶向高深深自责，“一自名山传梦后，只今玉带愧横腰”；青芝山上，古洞前，他劝诫未遇的好友，“我已投林君早出，沧江未许恋渔矶”；长乐晦翁岩，面对朱子读书处，“怀贤莫起前朝恨，留得名山此日看”。

在福州乌石山天秀岩下，一方不到6平方米的石壁上，有我熟悉的草书。我瞬间认出了它。龙飞凤舞，苍劲圆润。前一、二行有刻意收敛的庄重，后半部恣意飞扬。我分明看到了政治家的

忍辱与负重，也看到了士人天性里的放达与不羁。

薛君和招同林谨任、陈泰始、洪汝臣诸公集薛老庄，分得“东”字。

名园开宴集群公，河朔风流此日同。
 槛外林光连百雉，天边江影落双虹。
 峰传薛老人何在，尊入平原酒不空。
 莫向邻霄台上望，烟尘今正起辽东。

这是1619年的夏日。一位薛姓主人做东，招呼四方友人饮酒作诗。也许天气燥热如今。雅集上的交盏谈笑，无法抹去叶向高的担忧。他不忍向乌石山的最高处望去，千里之外的辽东，烟尘正起。

此时，叶向高已归田5年，但朝廷局势无任何改观。万历皇帝依旧荒政，朝务壅塞，民变烽起。内忧外患下，北方女真崛起。

就在前一年，1618年的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宣布起兵反明。

彻心彻骨的痛与担忧，让这位旧臣寝食难安，整夜整夜地不眠。次年二月，辽东兵败，叶向高的失眠症犯了。

两年后（1621），辽东战事危急，天启帝一再下诏召还，叶向高再次入阁。3年后，他再次失望而归。

之后，女真铁骑一路向南，势如破竹。

一语成讖。1627年，叶向高辞世，享年69岁。在他去世17年后，他曾日夜为之操劳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塌，宣告灭亡。

一个新的王朝建立。

郑成功与福州

许维勤

2022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复这块极其重要的固有领土，奠定了郑成功永载史册的中华民族英雄的崇高地位。历史人物的性格与经历往往复杂丰富得多，其中郑成功与福州，就有很生动的故事。

1. 初进省城——乡试考生

郑成功幼名福松，162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市千里滨，是明末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头目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中日混血的女子田川氏。福松5岁那年，父亲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担任海防游击，并很快累功升到总兵。总兵官郑芝龙手握重兵，累财巨万，在故乡南安安平港建起豪宅安顿家室，并希望子孙饱读诗书以洗却自己早年经历。福松7岁那年，被接回安平接受私塾教育。

据多种史料记述，郑福松天资聪慧，父亲为

他专聘名师启蒙，改名郑森。郑森文武兼修，领悟力强，10岁能文，勤练武艺，尤喜《春秋》《左传》和兵书，崇拜英雄，写得一手好字，喜作豪迈章句，谈吐见解超于常儿。叔父郑鸿逵特别喜欢他，期之曰：“此吾家之千里驹也。”

15岁那年，郑森通过考试，进入泉州府南安县学为生员。但也有不少史料记载，郑森在南安县学，并不是个优秀学生。据乾隆《潮州府志》“名宦传·郭子奇传”云，揭阳人郭子奇曾任福建提学参议，时郑森为南安诸生，考试成绩欠佳，其父郑芝龙被封南安伯，希望儿子列入县学食饩廩生，以相夸耀。有人说情：省里抚按都要拉拢他爹，就给他过关吧。但负责考课的郭子奇为人正直，“卒不允”，郑森连个廩生都列不上。不过，列不上廩生，也不能由此断定郑森有多不堪。据《惠安县志》和《广阳杂记》记载，郑森读书时与惠安张若、晋江杨于两来往密切，常来

往于南安、惠安、晋江之间，“论文赋诗，风雨联床，不稍间也”，可见他读书还是上心的，绝非不学无术之辈。只是家庭条件的优越，养成了他落拓不羁的公子哥秉性，不擅长作中规中矩的八股文章，对于古板的科举考试训练，常有叛逆的表现，耍耍公子哥脾气，也属人之常情。

1642年，郑森18岁，到了参加乡试的年纪。这时他父亲已加官都督，权倾一方，“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这样家庭的贵公子参加乡试，自然比较特殊。据时人李世熊《寒支集·郭宫詹传略》所记，郑森从泉州到福州，一路上“邮传馆舍皆有司备役”，吃住都有官方安排。进入考场后，监考官安排专人到郑森的号舍嘘寒问暖，还特别选定一个同舍生代为起草答卷，郑森则悠闲地品尝为他专送的珍果佳肴，“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但他这次考试，偏偏又遇上耿直的郭之奇。此时郭之奇已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对郑森的做派看得很不顺眼，没让他中举。次年二月岁考，郑森文章写得还算通畅，但南安县学优秀考生很多，郭之奇权衡之下，还是只给他评了个二等，依然不够食饩资格。这条史料，是李世熊以在场参与阅卷口气所记，应该不虚。

郑森初入福州考试受挫，也算意气过于张扬的青春所受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教训。当然，以他显赫的身世和不俗的学识，这样的考试挫折并不怎么影响他的前程。他本就不是能够遵从父亲的安排通过读书更换门风之人，对于按部就班的

科举功名进阶并不上心。后来的风云人生表明，他更注重的是追求实际学问，志在动荡的世态中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2. 再进福州——才俊青年

郑森考不上举人，前程依然通畅。崇祯十七年（1644），21岁的郑森被送进南京国子监太学。明朝对有功官员常给以“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的奖励，朝廷在战乱中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允许富家为子弟纳财入太学。郑森对于在国子监太学读书的机会很是看重，毕竟那是全国最高学府。据说郑森入学后拜鸿儒钱谦益为师，钱谦益对气宇不凡的郑森也很赏识，为他取字号“大木”，赞赏“此人英物，非人所得比也”。

但动荡的时局却不允许这位有志青年静心读书。1644年五月，清军攻占北京，建立清王朝，年底挥师南下直逼江南，南明弘光朝迅速瓦解。郑森在太学的书也读不成了，只好回到福建南安老家陪侍母亲。

弘光朝虽亡，明朝在南方实力依然不弱，在浙江等地的抗清斗争还坚持了一段时间。其中唐王朱聿键在明王室中尚属胸有大志之人，在一批文武官员的拥戴下向南转移，准备建立新的抗清政权。倡先拥戴朱聿键出任监国的，就是郑森的叔父郑鸿逵，时任镇江总兵、镇海将军。郑鸿逵与黄道周等大臣簇拥着朱聿键往福建撤退，由福建都督南安伯郑芝龙迎入福州。1645年闰六月初

七，朱聿键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朱聿键以监国在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以福州为临时首都，称为福京，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

隆武帝虽已贵为帝王，但他原先的唐王身份，在谱系上同崇祯帝相距甚远，缺乏自己的军政班底，号召力不足，整个政权的武力支撑，主要依靠手握十余万生力军的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这种背景下，郑家自然备受尊荣。以拥戴之功，郑芝龙加封平虏侯、郑鸿逵加封定虏侯、郑芝豹加封澄济伯、郑彩加封永胜伯。这年，郑森 21 岁，正是可以出来做事的年纪，家族皇宠正盛，他也就从老家南安来到福州。这是史料所见郑森第二次进福州。

先是，郑鸿逵带着儿子郑肇基陛见隆武帝，隆武帝特赐姓朱的荣耀。郑芝龙闻知，第二天也带上长子郑森觐见。隆武帝一见郑森仪表堂堂，气宇不凡，非常喜欢，便问起他的学问志向，郑森对答如流，问以军国大事，也能谈出过人的见解。人到中年的隆武帝喜出望外，手抚郑森之背感慨道：“可惜朕没有女儿，不然就嫁给你！”特赐郑森国姓朱，并赐名成功，“以駙马体统行事”。从此，人们不再叫他郑森，而叫郑成功，或称他为“国姓爷”，有时也直接署名朱成功。

隆武帝对郑成功的特赐，自然带有笼络郑芝龙的意思，但也确实出于对郑成功才识的赏识，朝廷用人之际，特别需要有锐气的年轻人。隆武帝把他留在宫内，作为贴身侍卫和负责宗室护卫。

隆武帝虽贵为帝王，但他不见得指挥得动飞扬跋扈的郑芝龙和郑鸿逵；郑家兄弟拥立隆武帝，也不见得志在抗清，而更多的是想挟君自重。郑成功则比较单纯，他遽受皇恩，真心想着如何报答，而且他饱读诗书，传统思想浓厚，也想干一番忠君报国的大事，对父亲的小算盘也有所察觉和不满，曾对父亲“屡谏以尊朝廷，恢复中原，遭其父之怒骂”。父子多次激烈冲突。一天，郑成功见隆武帝愁坐叹气，跪拜说：“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有异志耶？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矣！”

隆武帝见郑成功忠心可嘉，第二年便令他“领兵出大定关”，让他在带兵打仗中得到实际磨炼。随后多次“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一十三名隶陈国祚标下，听国姓成功节制”，“其总理中兴恢复，御兵、饷、器甲，统惟卿父子是赖”，乃至任用为中军提督，可见隆武帝对郑成功大胆任用，并寄予与其父亲并重的期望。郑成功也不辱使命，多次往返于福州与闽北之间，力图巩固闽北诸关和扭转战局。无奈敌势强大，战局无法扭转。但在实战中，郑成功对敌我优劣认识渐深，也更坚定了抗清意志，建立起日后与投降清朝的父亲决裂的底气。

3. 进军福州——风云统帅

郑成功毕竟太年轻，既无法改变父亲降清的

主意，也无法另辟局面扭转隆武朝的颓势。1646年七、八月间，清军大举入闽，很快占领福州。隆武帝向闽西北撤退，在汀州被俘，随后被杀。九月，郑芝龙降清，不久被挟持到北京软禁。十一月，清军突袭南安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母亲被辱自缢。父降母辱，君死家毁，使郑成功大受刺激。他携带所着儒生衣巾，到南安文庙焚烧，仰天长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收拾所善亲信九十余人，收兵于南澳，得数千人，开始了叱咤风云的军旅生涯。

郑成功起兵海上重树抗清义旗，表现出过人的政治韬略和军事才能。他先是继续以隆武朝名义相号召，第二年，闻桂王朱由榔已在粤西即皇帝位，改元永历，立即奉永历为正朔，以“国姓招讨大将军”名义行事，练兵鼓浪屿，整合郑家旧部，攻海澄、战泉州、取同安、收铜山、略粤东，通商养兵，广募人才，尊奉朱明宗室，优



考古发掘的明代闽安城遗址

养旧朝官员。经过与清军反复较量，队伍不断壮大，十余年间，形成一支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拥众十余万，与清军周旋于东南沿海的劲旅。于是，就有了一次攻打福州的军事行动。

郑成功军兴海上，大的战略目标是举行海路北伐直取南京。为此他不但要控制南澳到舟山之间的众多岛屿，而且要拓展沿海腹地，以保障兵源和物资供应。攻打福州，就是一次拓展兵饷来源和扩大政治影响的大胆尝试。他对这次军事行动非常重视，亲自统率。1656年七月，郑军船队从闽江口上溯，攻克闽安镇。据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记述，郑军于七月十八日攻占闽安镇，后分水陆两路攻打福州：陆路由鼓岭走山路，十九日进入鼓山下各村及东北一带；水路继续沿江进溯，二十一日到达南台至洪塘等地。两路形成对福州城包围之势。

省城被围，震动清朝，清廷严令地方死守。清军选择郑军力量薄弱的陆路出击。郑军被击败，只好退回闽安镇。郑成功对闽安镇据点非常重视，于九月间亲自视察了闽安镇一带地形，认为这是福州的门户，令工官冯澄调集民夫增筑土堡城寨，为长久之计。还在罗星塔、萧家渡拨兵戍守，由后提督万礼坐镇闽安，总督水陆防守。

这一部署，目的是在福州外围设置重兵，牵制福建清军主力。十二月，郑成功统舟师绕到福州以北的梅溪登陆，经飞鸾、白鹤岭攻罗源、宁德。清郑亲王世子济度派梅勒章京阿克善等将率军来援。郑成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败来



山上今闽安中学大楼所在地，当年应为郑军所建闽安寨城的制高点



远处伸入江中的台地，当地人称为“郑爷鼻”，传为郑成功在闽安训练水军时站立处

援清军，击毙阿克善，吓得罗源、宁德二县守城清军闭门不出。郑成功作战意图本不在于攻城略地，分遣官兵到二县各地筹足够三个月之用的军粮后，主动撤离。

省城不易攻，1657年夏秋间，郑成功审时度势，转为北上进攻浙江台州，抽调后提督万礼部主力随行，闽安镇守军出现空虚。清闽浙总督李率泰乘机抽调满汉大批军队，分水陆三路进攻闽安。九月初七日，清军水师出闽江口切断海上来援的郑军。初八开始，陆路分兵两支，一支由鼓山出发，一支由南台西路出发，包抄闽安镇，当天展开激战。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闽安寨城，坚守寨城的是郑军前提督属下右镇余程所部，由于兵单势薄，到十四日，余程和部下战士全部阵亡，闽安镇失守。清军转攻罗星塔寨，据守该处的郑军陈斌、卢谦力单无援，率官兵1300人向清

方投降，李率泰以投降不及时为由，将降军全部处死。至此，清朝福州省会的外围威胁，全部解除。郑军固守闽安镇前后长达一年多。

郑成功大张旗鼓进军福州，显然并非一个真实的战略重点。以郑成功对敌我实力和优劣势的认识，他不会把主力用到省城去与清军硬碰。福州历来无险可守，即使攻下也长久不了。郑成功的真实目的在于为北伐南京做某种试探，威胁一下福建省会，既可扩大政治影响，分散清军调防兵力，又伺机筹措军需和建立战略支点，从这一点上看，郑成功的这次军事行动，还是收到了一些不错的效果。但他对闽安镇的部署，在主力进军方向改变以后，缺乏进退的灵活性和策应的有效性，战术部署不够细密，结果牺牲将士数千，这也是个不小的损失。32岁的军事统帅，将继续在严峻的战火考验中走向成熟。

江上阳岐

唐 希 / 文图

1

闽江南港乌龙江从怀安分港后流经洪塘，向南过凤岗，在湾边、阳岐附近开始折向东流，经过螺洲之后在峡江之东与白龙江汇合。行舟人自古便将这乌龙江分段命名为洪塘江、金锁江、阳岐江、螺江、峡江，各有各的水土与风流。

阳岐江段是个风水宝地。发源于戴云山山脉的大樟溪在这里汇入闽江，如同一条小龙迎向大龙。“龙”裹着的沙石带着武夷山信息、戴云山的芬芳顺水而下，两江水合力斜向冲往乌龙江的东南岸。岸边有什么？远古的造山运动给这江岸留下了山体，又因为江水在这里转向东，水流速度因此减缓，造成泥沙沉积。江水不懈的旋回成就了江岸山体旁一片沃土沙洲。这个地方在山之阳，有山有水有沃土，前人称它为阳岐。

福州城南的高盖山是南台岛核心区高峰所在。它位于福州古城正南方，本是福州城南的案山，供奉着城市的“香火”。高盖山汇集的水流以山体为中心向北向南注入白龙江和乌龙江，构

成南台岛的重要水系。而向南流经阳岐的水，配上一个阳刚的名字叫午河。它虽然不长不大，却与大樟溪隔乌龙江遥相呼应，成就了阳岐水乡的风韵，成为阳岐不可或缺的文脉。午河上的午桥又称五门桥，始建于宋代，是闽南、莆田方向进出福州的古驿路桥，桥石护栏板上的题刻古朴沧桑。

众多水系的汇集旋回，造就出日月洲、三土洲、生园洲、六分洲……每个洲的命名都是一段美丽的传说。沙洲分分合合，水网千变万化。六分洲的形成告诉人们六个大家族共享沙洲是一种人文与生态的平衡。这种平衡逐渐繁华了六分洲与陆地村落间的河网，最后因木材商号的云集、成片的木排停泊，俗称为“木排江”。西行的木排江与南流的午河在阳岐入江口汇合，它们与乌龙江共同形成阳岐人文的血脉。

乌龙江阳岐段的水面是平缓的。从大樟溪口之南通方向漂来的商旅行船在干流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地顺势向阳岐靠拢。阳岐午河口的陆岸自然成为天然的码头港湾。莆田、仙游地区内陆商旅出入福州大多走的是这条水陆便捷之道。明



1982年阳岐水乡景色



午桥旧貌



玄帝潭

代万历年间开始，沿海的莆田、仙游进出省城，为了避开峡江的急流，将官道改至水流平缓的阳岐江，选择福清方向经尚干水道，逆乌龙江到阳岐，这里成为福州南驿道的起始地。丰富的南北京果、杂货、土特产在这里屯集，然后经陆路转运到福州商贸核心区上下杭、中亭街等地；同样，从世界各地舶来的洋货、各大城市的工业产品也从福州城里转到这里，再登船分散于永泰、福清、莆仙乡村各地。

五通港、南驿道渡口、尚书马渡口、避风港码头先后成形，兴化道、化船道、渡船头的地名因此而生。人流、物流从这里上岸，日积月累，一个江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埠形成了。

作为商埠，还得有水岸腹地。

福州人称福州城里有众多的小山如于山、乌山、屏山等。历史文人将此情景编排得十分顺口，叫作“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阳岐地盘不大，但有人将阳岐众多的小山也排列组

合成阳岐的“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

看得见的阳岐三山是：伯仲山、鳌头山和崎角山。除了正名之外还有不少小名，比如鳌头山又叫鹅头山，崎角山又叫鸡角山……其中的崎角山最高，海拔大约 21 米，原本它们都是水边的高地，当江水浮沉的时候，逐水而居的人们便会选择在水边的高地上聚居，形成村落。当村落与村落相连的时候，一个大村镇便开始了它的人文之旅。藏在民居中的三山是：玉屏山、李陀山和山头岭。当地文化人命名看不见的三山，原来是水中的三堆花岗岩，福州方言称之为“栏潭”，分别是乌龙江边妈祖庙前的桃花潭、状元境前河浦中的状元潭，还有午河与木排河汇入闽江口的玄帝潭，在闽江水潮涨潮落中时隐时现。

2

现今阳岐的 5 个村落共有 30 多种姓氏，600



严氏祠堂



修葺后的严复祖居大夫第

多户人家。历史并无记载谁是阳岐最早的居住者，却不经意间记录了在这里落脚、生根、成长的旺族。从民间的档案族谱和祠堂、祖居建筑中看水乡泽国的阳岐，注定了这里的居民自古必以农事和水运渔获为生计。花果以及成片的蔬菜是它作为百花、千果之乡的主要农作物。福州地区常见的名木花卉阳岐全都拥有，福州民谣中关于12个月的水果歌在阳岐几乎不缺。于是，一方水土、一片花果养育着这一方百姓。

下岐是江山陈氏较早的迁徙定居地。现存的祠堂始建于明朝末年，清初有过大兴土木的记载，以实物记录着家族最鼎盛的风光。午河北岸陈厝弄里的陈氏祖居应是更早的建筑，明代的木构保存到今日便是奇迹。早些年，有东土归来的陈氏后人或文化学者，拎着旧文献，扛着摄影录像设备在这里长时间地流连、感叹。

严氏祖先以大夫的身份在上岐定居，奠定了严氏作为当地名门望族的文化基础。其旧厝“大

夫第”因为曾经住过少年时代的严复而名扬四方，定名严氏祖居。始建于康乾盛世的阳岐严氏宗祠，现如今是福州阳岐严复纪念馆。

福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叶大庄、名医赵飞翰……都给阳岐留下了风采，阳岐的土地也包容了闽江水上的漂泊族群。以舟船为车马的族群在历史上常常被主流社会排斥，而阳岐的码头道头、商场集市、滩头沙洲、庙宇商埠……早早地便给了他们生存的空间。

有史以来，阳岐的水岸都是水上居民聚泊的港湾。闽江上的船户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是闽江最早的原住民。在他们的血脉里，与古闽越族、台海高山族、南岛语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历史长河中，也不乏汉民入彀，原本陆居的汉民，在生活的风雨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水上居民的船队，成为闽江风浪中的漂泊者。舟居、耕海千百年，水上居民们偶有上岸，也栖水岸而居，搭建了防潮通透便捷的干栏式建筑。因

了水部尚书陈文龙的共同信仰，阳岐是水上居民较早登岸聚居的地方。依水岸而居的民宅与城乡汉族聚居地的建筑有着不同的风情与韵味，居住其间的人们更是有着不凡的乡俗。

3

水部尚书陈文龙信仰给了阳岐一个人文大机遇。

那是南宋末年的事了。统治者自称的南宋王朝在福州登基的小皇帝只有七八岁，所剩无几的江山风雨飘摇、苟延残喘。闽人陈文龙据城抗元，兵败被俘，在押解杭州临安之后，在岳坟前绝食而亡。作为闽地汉人抗元的精神领袖，其追随者创造出文化偶像供人顶礼膜拜。这“文创”的任务便由阳岐人来完成。

阳岐有个妈祖道，是莆田藉商人、水手和码头工人的聚居地。陈文龙为宋捐躯之后，追随者们的怀念有着从灵堂开始绵延至庙宇建成的全过程。在游牧民族高压统治下，祭奠先人的表达方式是奇特的。找一件陈文龙用过的衣物认作血衣，更可能是当年参与护送囚车北上并收尸的亲历者从杭州带回的遗物，加上神秘色彩，对外宣告是从海上水路漂回故里的神奇灵异之物。于是真事隐去，假以村夫之语。最早，陈文龙纪念堂呈现的是民间信仰的形式，明永乐六年（1409），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庙宇立于妈祖道的妈祖庙旁。以其独特的民俗语言将效

忠大宋的思想传播民间，信众越来越多。各个族群、各种职业、各类身份的人，包括岸上村民和水上疍民，甚至是阳岐的路人都可能被感召而融进信众的队伍。阳岐陈文龙的水部尚书庙因此被认为是汉民与疍民共同信仰的庙宇，这在福州地区或许是稀有的。

传说越来越神奇，传播越来越远。福州市区沿闽江两岸有了信众，有了庙宇，仅台江码头与商贸区坞尾及三保就有两座规模较大的尚书庙。每年迎尚书和状元船出海的活动，都以大型民俗活动的形式向人们传播爱国爱民的正能量。阳岐是这个民间信仰的策源地，这里的尚书庙始终是被公认的祖庙。

在众多的信众与林立的大小庙宇中，为了确立其祖庙的地位，20世纪初，阳岐人策划将尚书老庙从港口道头迁建到崎角山下地势平坦开阔的沙洲地带，并在民国风格的青砖墙上镶入花岗岩匾额“尚书祖庙”。在这次迁庙活动中，中国近代重量级的思想家严复成了轴心人物，那花岗岩匾额便是出自他的大手笔。

4

严氏在阳岐是个旺族，其先祖以大夫的身份入住上岐村。这里不仅有严氏宗祠，背靠伯仲山，午河的东岸还有座大夫第，那是少年严复居住过的地方。在科举考试的时代，严复因家庭贫困而被迫选择了船政之路。他便是从这里考进船

政学堂，开始了他的闽腔英语的学习，在留学欧洲的机遇中不仅关注坚船利炮的制造与操纵技艺，更关注产生这种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思想与社会制度，考察并研讨之。他在出洋之子中，是少有的不直接从事海军职业的人。他教书，当校长，办报刊，撰文稿，著书立言……最后成就了从西方“盗回”人文思想火种的伟业，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世箴言开启中国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严复晚年回到福州，居市中心郎官巷之余常回阳岐。其间有两件事必说。其一是在玉屏山下购一小院落，为儿子娶亲做洞房。其二是发起众筹，迁建陈文龙尚书祖庙。让百姓有信仰的同时，让乡村有文化，让庙会有香火收入。1918年末避寒从北京返乡，次年初到庙里行香，为重建新庙作“启募缘”，首捐2000元，并让福建督军李厚基也看他面子掏腰包。1921年5月底，他专程察看庙宇的修建并题写了柱联，“入我门来总须

纳手扪心细检生平墨籍，莫言神远任汝穷奸极巧难瞒头上青天”。这时离他去世不到半年时间。一个考察世界的思想家，在人生句号的收势时刻，投身于故乡村庄的民间信仰建设，其思想层面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庙宇本身。

5

玉屏山庄作为水乡泽国中的园林，在福州是著名的。

水边高地玉屏山早早地被人居建筑包围，与李陀山、山头岭并列于“三山藏”之中。玉屏山因为阳岐的又一位先贤叶大庄的大手笔而凸显并名扬闽江流域。叶大庄中举、当知县、办洋务，在知州任上因赈灾而深得民心，他又是个诗人，是诗名引出的文化名，才让他的大名在地方文化史上得以永恒。叶氏家族世世代代出藏书家，家族的每个藏书楼堂，都名垂福州藏书史。绿筠书



玉屏山庄内景



尚书祖庙

屋、荫余轩书楼、芝石山房、池上草堂……到了叶大庄时代藏书达到了高峰。为了藏书，诗人在临江的玉屏山建造了环山临水、以藏书为一大功能、同时集居住与园林于一体的玉屏山庄。这天辽阔的气势绝不是城市街巷中的书楼可比的。玉屏山庄的嘉名美誉引来了同样的藏书家、痴迷于园林建筑的龚易图。在他拥有了三山旧馆、双骖园、芙蓉园之后还筹划着在阳岐李陀山建园藏书。当年，如果李陀山有幸建成龚氏山庄，阳岐可能成为书虫们的朝圣地。可惜老天不尽如人意，阳岐有玉屏山庄足矣，便少了龚家建园林的缘分。无缘李陀山的龚易图与叶大庄友谊深厚，光绪年的一个秋后，他们结伴同行，从阳岐登舟，在大樟溪的濼下码头上岸，晚饭后举着火把冒夜雨入山，一路听涛闻虎啸，凌晨抵达方广岩寺。山间他们吟诗作联，还将这奇特经历刻在通往方广岩的山道岩壁上。

6

当人们将历史文化重新提高到文化宝藏的高度时，阳岐人意识到了尚书祖庙、玉屏山庄、午桥、严氏大夫第等古迹对于阳岐存在的意义。于是将尚书祖庙从翻砂作坊的工地中解救出来便成为当年最初的行动，毕竟尚书信仰文化根植在祖祖辈辈阳岐人的心中。严氏宗祠和大夫第里的严复故事更是被海峡两岸的学术界、文化界所关注。文化人几乎是在高速公路的推土机声中抢下



今日阳岐水乡

了鹅头山上的严复墓。还有午桥、古井、老厝、道头、街巷、庙宇……阳岐人是在密集的生存空间中挤出文化来，补充、完善在风雨中丢弃的历史养分。

在乌龙江水边的阳岐失去了水网，这才是阳岐最大的悲哀。大自然的变迁与人类的滥用，水环境失去保护，让原本的水乡不再泽国。水陆交通方式的变革使得原本是水网枢纽的阳岐被陆路边缘化。为了让文化名镇实至名归，必须从水网改造开始，那是阳岐的命脉。将淤积的河道疏浚，将被人类占用的空间还给水系，让水乡风情重返水网沿岸……

让历史从史料与传说中活化成可展示、可叙述的现代传播。让古街巷、古厝、古建筑活化成今人可行、可居、可欣赏和古今兼容的美景。将与水乡风情相关的业态引入今天的阳岐，营造当代人活生生的生存空间。期待着、纺织着阳岐水网的文化回归。

白马河，故乡的河

郑和

涨潮汹涌、退潮又静静流淌的白马河是闽江的一条主要支流。在无自来水年代，两岸居民都在河中汲水，洗衣物、家具，白马河哺育了义洲、帮洲两岸的人民，她是我故乡的母亲河。

不知从哪个朝代起，闽北山区的木材，从沙溪、建溪、尤溪、梅溪、富屯溪、大樟溪，漂运进闽江的这条内河，排列在这条支流上，河的两岸从彬德桥、洪武道、纸道，一直延伸到山仔里、浦东桥，全长近5000米。1949年前后，陆路交通不发达，水运成了主力，因为它成本低，一艘民船，两个船民，一个船尾摇橹、一个船头撑竹篙，便可以运输两三吨货物。排工们把上游砍伐的木头，连缀成排，顺流而下，停放在白马河宽阔的河面上，形成“排坞”。储木场的扛搭钩这个职业就产生了，搭钩排工把一根根的圆木、排梢钉上竹钉，用竹缆或直条树枝连缀成木排排在水中，这样让木材可以吐脂、晾干，木材的稳定性提高了。

白马河一带与汉口、安东并称三大木材集散地。林业中有句话，叫“水浸万年杉”，因为明清建筑主构架是采用杉木的。福州早年民居建筑多是木构为主，因为成本低，材料多，需求量大，而形成了福州多达几十片的木屋毗连区。风火高墙虽属富人与达官的专属，但内结构仍需木材。

于是白马河畔“伙贩”这个行业便应运而生，“伙贩木帮”们把放排工从闽北漂流而下的木材，接手转卖到闽中各地乃至外省。我爷爷1910年便选择在材料充沛的“伙贩街”安家连做“涂亭”（大木工行当）工场。我们一家人从此就从长乐首占乡的农民变成了福州市民。

20世纪60年代，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炎热的夏季，游泳既是体育锻炼又可以纳凉降温。尽管白马河每年夏季都有人溺亡，但少年青年们依然趋之若鹜。尤其是暑假期间，父母亲上班，无人管束，我们五个兄弟便仿效邻居伙伴们在河水较浅的纸道头浸泡，学游泳。一天，爸



爸回家发现晾晒在竹竿上的小短裤，便问大哥，大哥矢口否认。内行的爸爸用指甲在大哥的手臂上画出一行白道来，谎言就不攻自破。于是父亲决定“杀一儆百”，大哥遭到父亲的竹条鞭笞之苦，游泳活动便消停了一段。但是酷暑难耐，加上邻居伙伴们的诱引，不久又死灰复燃。

“堵”不如“疏”，当小学教员的母亲，便想办法，把大哥送进暑期的少体校。大哥学成回来自然教四个小弟。先扑在满水的脸盆中学闭气。我将闹钟放旁边计时，五兄弟中我的肺活量第一，能憋气1分25秒，后来在50米的泳池能潜游48米。个把月后，我家五兄弟就天天扑腾在白马河中。蛙泳、潜泳、自由泳、仰泳、侧泳便成了我们的拿手绝活，此时父母亲便放任我们去游泳。小时的我初生牛犊，涨满水时，能从白马桥栏上纵身跃入水中。有一回，我从南岸木排上潜水而入，居然潜到北岸的木排下，睁开一看，黑洞洞的，内心知道潜过头了，赶紧回头，等见到了光亮，跃出水面，惊出一身冷汗，还不敢告



诉兄弟们，怕走漏消息，让父母下“禁游令”。

一天退潮水浅时，偶然发现河床脚底下有刺痛的感觉，潜下一摸3个蚬子，于是连续不断地摸，不但摸到几十个蚬子，还有河螺。放在河边用衣服包着带回家，养在清水中吐沙。爷爷早年是个老农，他说明天你们带个小木桶去。爷爷带着我们五个兄弟一起上，正逢廿五“水塌库”，五人摸了半木桶蚬子、河螺。清水养了一天，炒红糟，一家人美餐了两顿。爸爸、妈妈见减轻了他们的伙食开支，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落潮时我们又发现在白马河边的纸道头旁有一“千七”评书场，评书先生的锣钹声令我们爬上驳岸，在户外阴凉处旁听。那时有著名的评话先生，我记得有小神童（绰号）、陈春生、小春生、天天（绰号）、唐彰文、吴乐天，听他们讲《三国演义》《杨家将》《七侠五义》《岳飞传》《八美楼》《徐秋影案件》《狸猫换太子》等故事，听得入迷。评话先生们多半采用章回体小说，叫你听了上集，留下悬念，还想听下集。于是天天



白马桥

游泳、听评话成了暑期的主要内容。

我的邻居小许，常邀我去福州玻璃厂（旧白马河的末端）职工澡堂洗澡。沿着白马河畔，经山仔里、浦东桥就可从后门入厂区。意外发现，回收的废玻璃堆中有许多废铜、废铝、硬塑料，洗澡后悄悄地拣些藏入裤袋，从后门出厂到白马桥西边的废品店可卖大几角钱。有一回，拾了不少废铜，居然卖了5元多钱，两人平分各得2元多，于是白马桥上的饮食店，一碗6分钱的锅边，一块5分钱的炸芋粿，便成了我们游泳后的美食，大快朵颐。

“文革”前，靠近白马河边，复池路口的“复初庵”1949年后改为第三工人俱乐部，放映电影，一张影票2角钱。放映战斗片、反特片时我们也会光顾。“文革”后河畔的教工礼堂放电影，我们更是常客。

我们的游泳水平高了，横渡白马河、闽江

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开始算潮水选择纵向游。我们常到白马河起点彬德桥处起游，于是彬德桥便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彬德桥是闽江进入白马河的“第一桥”。它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大批木材商聚集于此，组成木帮商会“彬社”，他们为穷人义葬、救火、修桥，为表彰他们的德行，桥以“彬德”命名。

白马桥是白马河上最长的一座桥。从白马路进入，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白马津渡”。白马桥始建于清末，是连接上下杭与义洲地区的路。

“文革”前白马桥有近百米，1961年南岸木屋区火灾后修复用地，河岸被填。现全桥长74米，宽3米，有东西引桥各12米，为石构的平梁桥。听我爷爷说，桥上原有马口铁雨盖，既可遮阳又可挡雨，一次台风把它吹掉了。原为三墩四孔，现为二墩三孔，用条石、块石叠砌。桥栏21对、望柱石22对，刻有石狮2对，瓜果、花卉8对，八角石12对，雕刻精美。遗憾的是2对石狮在“文革”时被砸坏。1992年白马桥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爷爷还说，福州沦陷时日军在白马桥头设岗哨，杀戮同胞，侮辱妇女，过往行人都要向其行礼，否则就弹鼻子。我爷爷曾受过屈辱，而后改道从彬社的木桥绕过。

我虽然因拆迁搬走，但还时常魂牵梦绕我孩童时生长的地方。如今我站在桥上，已不见那成排成对的木排，也少有运送货的木船。想想当年站在桥栏上纵身跳下的往事，还有点后怕。

儿时故地利发埕

王发枝

步入老年，记忆力减退，却对儿时的生活和宅居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屋记得格外的真切。近年来每每走过利发埕（如今的利发巷），不知不觉间会想起少年的我，站在当初尚未移位的三通桥桥墩上，一跃而入河中畅游。

耳边便响起了与邻居孩子在河边抓螃蟹钓小鱼时的欢笑声；想起了头戴树枝“帽子”捉迷藏打野仗时汗流满脸的样子；想起了每天早上有人牵着奶牛，挨家挨户挤牛奶的味道；想起了傍晚用两个牙膏壳，在“锵锵扣”的声音中打下两三块麦芽糖，咧开嘴唇流淌的口水……随着上下杭街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成了记忆！

小时候的利发埕，是福州城内唯一有东通小桥、西通三保、南通新桥仔，并与三通桥隔河相望的一条小巷。它和“黄金之地”的中亭街，只隔不到百米之长的观歧巷与一座木桥，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石板铺就、不足2米宽的利发埕小巷，最多只能并排通过两辆三轮车。整条巷仅仅只有9座房屋：除了门牌为“利发埕9号”的那一座孤单建在巷子另一侧，其他1—8号均临河建盖。巷道尽头临星安河一侧即利发埕8号。利发埕9号现改为利发巷的59号，是“台江旅游集散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福州刚刚解放不久，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利发埕8号对面一大块带有小土坡的空地，还存有两个防空洞。那是我和小学同学捉迷藏躲猫猫的藏身之地。利发埕9号的右侧隔着巷道挖有防空洞的那一大片空地，是9号宅院的菜地：靠巷的前后右三个方向，均有用竹篱笆隔成的围栏，里面种着许多蔬菜，长着不少灌木，还有不少小土堆。菜地一侧就是现在的星安河畔，一条狭窄不堪、碎石烂泥铺成、仅有一米多宽的小径。记得小时候，如果没有小伙伴或大人相随，我几乎不敢独自行走。



利发埕 61 号



改造后的利发埕院落

究其因一是脏二是臭，那是利发埕、合春弄、利发河墘等不少巷弄，拉来的粪便装船运走的地方。但千万别低估这条小径，因为往前可以通到旧时称利发河墘（现为利发巷 89—93 号）的杨文畴九姨太公馆——“九奶奶府”，那可是当时福州市区为数不多的中西建筑风格的宅院。

其实利发埕 1、2、3、9 号宅院，丝毫不比“九奶奶府”逊色。当时的 1-3 号与今天的 9 号，均为砖砌围墙、门框为大理石的大厝，与存世的利发埕 9 号相比，除了少几个台阶之外，其内架构几乎一模一样：院落两侧为风火山墙，轩架、隔架、垂花柱、雀替、插拱等构件雕刻精美，图案考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利发埕 4 号，或许是利发埕原有的 9 座房子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座。

如果说“九奶奶府”是中西结合建筑的产

物，那么利发埕 4 号则是地道的西式洋楼。迈步进入 4 号厚实的围墙大门，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平地，中间有一条石子铺就的人行道，两边是小巧玲珑的花园与假山。若要想进入矗立在你面前的那座洋楼，就必须抬腿走上几级精致的石阶，否则你只能望着那高耸的阳台与西式窗口，啧啧称奇。4 号洋楼的后面修建了专属的“小码头”，近 10 级长长的石阶通向河中，那是专供这座宅院里的人们洗菜洗衣、乘船外出的地方。

小时候在河里游泳，向新桥仔即闽江方向游的时候，我会在那里做一次短暂的休息。当时住在利发埕的孩子少有串门的习惯，我对 4 号洋楼还依稀记得，是因为有一天院内的昙花盛开，主人开门让我们几个邻居大人带着小孩进去共赏昙花一现的奇景，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昙花真实的样子。

当时住在利发埕7号被人称呼“三伯”的老人曾经告诉我，这洋楼的真正主人，是姓杨的大亨，1949年之后就举家搬走。有说去了台湾，也有说去了美国。利发埕4号，由私改公。而利发埕余下的5号与6号都是福州的柴埕厝，8号则是像柴埕厝但又像西式建筑一样涂抹着浅蓝色油漆的二层木屋，里面也有小小的假山与花园，十分雅致。

我居住的7号则是利发埕1-9号中最为独特的木头厝：土墙中间石头为门框，有着厚重的柯木二扇大门。左边的门框里又镶嵌着一扇小门，方便晚上人们进出。进门之后有近百平方米的空埕，靠着6号房子的一侧有一棵大树，树旁突兀地搭着二层小屋，小屋的主人当时六七十岁，那就是人称“三伯”与“三姆”的老夫妻。可别小看当时60多岁的三伯，那可是个见多识广的老人，无论是《七侠五义》，还是《隋唐演义》，乃至《红楼梦》，这些故事都藏在他的肚子里。

儿时夏天的傍晚，我们总喜欢围在三伯的身边，他边吸着水烟喝着茉莉花茶边侃侃而谈。说到高兴之处，他会猛地站起来，用手脚比画、口水四溅，那模样完全不像是一个老人。记得三伯临去世的前半年，他还送给我一本如何用野草野果维持生命的古籍。可惜“文革”时期，我把这本书连同我收藏的20多本书付之一炬，至今想起真是悔之不及……

20世纪50年代住在利发埕的日子里，从早到晚总会听到有不同的吆喝声：清晨一听到“倒

马桶、倒马桶”的呐喊，每家每户的妇人便提着那油漆的马桶，倾门而出。中午或傍晚，准有肩挑着担子，用瓢羹跟碗边敲边喊着“鱼丸扁肉也好吃”的吆喝，惹得邻居们拎着空碗出来买鱼丸或是扁肉。深更半夜则伴随着“噗噗”的敲更声，有温馨的喊声“寒冬腊月，天冷盖棉被，火烛小心”等，随着季节变化，打更人的词句也会变化：“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无论是倒马桶或是卖小吃还是更夫，喊的绝对是原汁原味的福州音。尽管这些声音，已经有近70多年没有听到了，但每每走到三通桥，耳畔仍依稀听到那忘却已久的叫卖声。

说起利发埕的历史，其实与合春商号杨氏世家，即杨启文、杨启善以及杨文畴还有点联系。杨氏兄弟发达之后，从合春埕开始，先后在合春里、合春弄、后洋里、安南弄乃至中平街购置产业，清朝中期又购买了几乎整条利发埕的地，成为利发埕周边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也是利发埕有不少杨姓及闽南人——当时被称为“安南人”的原因。

据说杨氏兄弟之所以选择在利发埕兴建房屋，原因有二：一是利发埕与他发家致富的合春埕相邻，中间只隔着一条合春弄。二是利发埕未开发之前就是临河的一块空地，取名“利发埕”就是希冀子孙能够“顺利发财的意思”。

近日空闲，又一次踏上旧地利发埕，站在曾经陪伴过我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地方，思绪万千。